

# 大连理工大学政治理论学习 参考资料

(2018年第6期)

大连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

2018年4月23日

## 准确研判当前国际社会思潮

### 【调查报告】

- 当前国际社会重大思潮演变趋势及风险分析 ..... (2)

### 【重点解读】

- 李靖堃: 民粹主义对世界政治秩序的新挑战 ..... (11)
- 赵怀普: 分离主义威胁欧洲稳定与发展 ..... (17)
- 王义枢: 欧美种族主义何去何从 ..... (23)
- 周永生: 极端主义的威胁与危害 ..... (29)
- 王锁劳: 2017 中东极端主义发展趋势 ..... (33)
- 冯维江: 认清逆全球化思潮的谬误 ..... (36)
- 庄贵阳: 绿色资本主义发展遭遇困境 ..... (42)
- 贾文山: 泛娱乐主义使娱乐成为愚乐 ..... (48)
- 刘 军: 2017 新自由主义思潮进入式微调整期 ..... (53)
- 孔新峰: 国际普世价值思潮的起起伏伏 ..... (57)
- 陈江生: 西方左翼思潮为何陷入停滞 ..... (63)

## 【调查报告】

# 当前国际社会重大思潮演变趋势及风险分析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

2017年，国际舞台风云变幻，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各种社会思潮汹涌澎湃、跌宕起伏。近期，人民论坛开展多轮次公众问卷调查，组织相关领域200余位专家学者深入研讨，对1200余位党政干部、企业家、青年学生等重点群体进行深度访谈，并参考近年来社会思潮演变趋势和国内外理论界研究成果，综合评选出2017年受关注程度较高、现实影响深刻的十个重大国际思潮。

## 2017年国际重大思潮的演变态势

**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影响力上升，跻身政治舞台中央。**在2017年欧洲各国大选结束后，尽管最终依然是传统中间党派击败民粹主义政党，继续在政坛上占据主导地位，但民粹主义政党以前所未有的数量或速度进入了国家议会或政府。在德国，选择党赢得592万张选票（得票率12.9%），比2013年大选多了将近450万张，选择党一跃成为德国第三大党，这是二战以后首次有民粹主义政党进入德国联邦议会。在法国，尽管玛丽娜·勒庞没能当选总统，但以“国民阵线”和“不屈法国”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政党，都从长期处于政治边缘到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在奥地利，自由党在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仅比第一大党人民党少4个百分点，民粹主义政党成为奥地利第二大党。民粹主义政党在冰岛、捷克等国也都取得历史性突破，跻身本国政治舞台中央。

**分离主义思潮在欧洲多国抬头，引起连锁反应，对欧洲造成了强烈冲击。**2017年对于深陷多重危机的欧洲来说可谓多事之秋，分离主义威胁着欧洲的稳定与发展。2017年3月英国上议院通过“脱欧法案”

之后，苏格兰地区的分离主义势力便宣布：希望 2018 年再度发起全民公投，以决定苏格兰是否继续留在英国。与此同时，北爱尔兰的民族主义政党“新芬党”也声称希望北爱尔兰能进行独立公投。法国科西嘉岛的“自由科西嘉”党领导也表示，苏格兰独立公投激励着科西嘉争取独立，科西嘉也将谋求类似的独立公投。2017 年 10 月，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独立公投则是欧洲分离主义声势最为浩大的一次行动，尽管公投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其对意大利、比利时国内分离主义的影响不可忽视。分离主义势力的抬头在欧洲多国引起连锁反应，对欧洲造成了强烈冲击。反全球化思潮和民粹主义的抬头，欧盟近年来遭受的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威胁和主权债务危机等因素进一步助推了分离主义的发展。

**表 1 2017 年国际十大思潮**

思潮名称	关注指数	影响指数
民粹主义	★★★★★	★★★★★
分离主义	★★★★★	★★★★☆
种族主义	★★★★☆	★★★★☆
极端主义	★★★★	★★★★☆
逆全球化	★★★★	★★★★
生态主义	★★★	★★★☆
泛娱乐主义	★★★	★★★☆
新自由主义	★★★	★★★
普世价值论	★★	★★★
西方左翼思潮	★★	★★

欧美种族主义在难民危机和民粹运动中复苏，“身份政治”沉渣泛起，群体间的矛盾对抗表现更加激烈。难民危机是欧美种族主义复苏的刺激因素之一，其给被移民国家带来巨大的道义与社会经济压力，原本属于欧美国民的设施和福利被难民占用，引起很多国家国民的强烈抗议，导致被移民国家出现排斥难民的种族主义。2017年2月，欧盟领导人发布应对难民危机的计划，其一便是如何阻止难民走地中海路线从利比亚前往直意大利，以及提升欧盟遣返难民的能力。除难民危机外，民粹运动也为欧美种族主义提供了温床。金融危机和欧元危机引发了有利于极端民粹主义的集体安全感的缺乏等情绪，进一步刺激了种族主义的高涨。种族主义在美国也卷土重来，2017年夏罗茨维尔骚乱引发国际社会对美国社会未来走向的关注，其实质是一起种族主义卷土重来引发的大规模恶性暴力事件。

中东极端恐怖主义肆虐和泛滥的局面可望得到有效遏制，但国际反恐斗争仍将面临诸多新的挑战，极端主义思想根除不易。2017年“伊斯兰国”（ISIS）大势已去：其所谓“首都”拉卡被收复，其首领巴格达迪被击毙，人员死伤惨重，独立的军队和行政体系遭解体。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崩溃是国际反恐斗争取得的重大胜利，近年来中东极端恐怖主义肆虐和泛滥的局面可望得到有效遏制，但在“后‘伊斯兰国’时代”，国际反恐斗争仍将面临诸多新的挑战。极端恐怖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相伴相生，是当今世界和平发展中的一大毒瘤，威胁着世界各国和全人类的安宁生活，“伊斯兰国”的孕育、起势和发展即是明证。今天，“基地”现阶段的式微、“伊斯兰国”“国土”意义上的覆灭，尚不能理解为二者在组织形态上的灭亡，极端主义思想并未随之未烟消云散。滋生极端恐怖主义的土壤是宗教原教旨主义，而一些国家和地区贫穷落后的经济状况则刺激了极端恐怖主义的发芽，其发展虽然得到有效遏制，但若要根除，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逆全球化思潮在欧美发达国家蔓延，全球多边事务合作进程受阻，不利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和未来国际社会的良性发展。2017年，逆全球化思潮与民族主义合流，产生了更大的“感召力”。在这个复合叙事结构中，本国或本民族被认为是全球化的受损者或被剥削方，承担了全球化分配不公的损失，而外国或其他民族成为了依仗全球化的加害者或剥削者。一些政治人士借此号召采取保护主义、排外主义、本国优先或孤立主义等内顾型举措，将逆全球化由思潮变为政策，如频繁发生的滥用反倾销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限制人口跨境流动的排外主义政策，以及退出承担国际义务和责任的多边主义合作等。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退出 TPP、《巴黎协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使得全球多边事务合作进程受阻。

### 国际社会重大思潮激荡的潜在风险

民粹主义的上升将凸显并加剧欧洲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政治裂痕，其活跃导致欧洲国家政治版图碎片化趋势明显。民粹主义政党影响力上升，传统主流政党优势地位下降。在德国，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在 2017 年总统选举中的得票率都创下了二战以来的最差纪录，而进入联邦议会的政党数量则达到了历史新高；而在荷兰，共有 13 个政党进入议会，是二战后进入议会政党数量最多的一次。在民粹主义的冲击下，欧洲各国原有的、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原有的“共识政治”正在被打破，有向“对立政治”和“极化政治”发展的趋势，不同党派、不同地区之间的政治裂痕加剧。在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发展同样导致各国在民主、法治等价值观问题上的深层矛盾逐渐凸显，为国际交往带来了不确定性；民粹主义外溢到更广泛的国际关系领域，将对全球化与世界秩序造成不利影响。

扩散化的分离主义思潮或危及地区和国际稳定，国内分裂分子可

能受到鼓动。对欧盟而言，日渐泛滥的分离主义运动若不能被有效遏制，将挑战欧盟的一体化进程，极大阻碍欧盟在对外行动上的一致性，使其作为整体发挥作用的能力受到极大制约。在世界范围内，冷战后结束后，一些国家内部曾长期被抑制的民族种族矛盾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逐渐迸发。冷战后的分离主义势力显示出一个共性，即多民族国家一旦开始照搬、嫁接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分离势力往往会趁势做强、做大。受到欧洲分离主义思潮扩散的鼓动，中国内部潜藏的疆独、藏独、台独等分裂分子可能假借追求民主政治的名号，趁机开展分裂国家的活动，动摇国内稳定发展的良好局面。

**新种族主义思潮激化国家内部社会矛盾，或将影响政府的合法性。**目前，由于非法移民的涌入，充沛了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资本，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应声涌现。这些政党反移民、反欧盟的主张获得了饱受移民问题困扰的大多数公众的支持，种族主义成为重塑主流群体认同的工具。近年来，西方的新种族主义中存在一种“逆向歧视”的倾向，即主张在教育、医疗、就业等社会资源的分配上照顾少数族裔和特殊群体，这在实践中往往被简化为不公平的定额制，给社会治理带来巨大挑战。长远来看，体制内的约束力量并不能阻止种族对立和身份政治动摇政策的合法性乃至政府的权威性。披上种族主义面纱的身份政治，让每一个群体都心安理得地追求偏向自身利益的政策安排，公民个体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被群体行为放大，群体间的矛盾对抗表现更加激烈。政府一旦不能满足其中一方的利益需求，政策乃至政府的合法性都将受到质疑。

**中东宗教极端主义思潮仍有死灰复燃的风险，应警惕极端势力的分流回流。**“伊斯兰国”作为一个准国家实体已不复存在，但极端分子伺机而动、负隅顽抗的可能性极大，极端主义思潮依旧有死灰复燃的风险。过去一年，“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的地盘被极度压缩，开

始采取分流、回流、转入地下活动的策略，更加频繁地在其他区域发动恐怖袭击，搅乱国际安全秩序。美国及其盟友对“伊斯兰国”大本营的持续空袭，造成了大量无辜民众伤亡，激发了生活在西方国家社会底层被边缘化的移民和少数族裔的“悲情”效应。虽然各国高压打击，但极端主义威胁仍然存在，恐怖袭击事件接连发生在土耳其、英国、德国、西班牙、俄罗斯等国家。中国虽然没有面临极端思潮的直接威胁，但极端主义思潮与网络新媒体的结合，强化了极端势力的影响与威胁，中国应警惕极端分子借助互联网传播极端思想，威胁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泛娱乐化思潮冲击主流文化秩序和价值观念，有可能成为操控公共话语的主导力量。**政治、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泛娱乐化带来的是价值立场的混乱和无价值的狂欢，可能冲击公众的理性价值判断，瓦解文化秩序和主流意识形态，造成道德沦丧、伦理缺失。美国的媒体人也对美国的泛娱乐化倾向直言不讳。反观中国国内，在泛娱乐化思潮的冲击和互联网技术的强力助推下，娱乐化倾向也逐渐膨胀：花边新闻层出不穷、直播表演露骨出位、戏说恶搞屡见不鲜……当严肃的历史和政治议题被泛娱乐化思潮绑架，其结果就是审美取向感官化、价值取向虚无化、政治态度戏谑化、道德取向去崇高化。

### **应对、化解各类风险的战略举措**

民粹主义在欧美国家的“成功”会起到示范和鼓励作用，中国应积极采取措施防止互联网民粹事件集中发酵。未来两年欧洲和拉美多国即将进入大选，西方民粹主义势力可能会有增无减，中国应该积极采取措施防止公众受到西方民粹思想鼓动，造成网络民粹事件集中爆发。首先，完善公民政治参与的途径，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带来稳定。中国的网络民粹主义盛行与人民群众线下制度化政治参与不足有关，这种不足造成了中国公众的政治参与存在线上和线下发展不匹配不

均衡的现象。其次，用完善的法律划定网络行为的边界，寻求言论自由与遵纪守法之间的平衡。既要打击造谣传谣、人肉搜索等网络暴力行为，也要保证网络空间活力不减。最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传播，用主流价值观念涵养中国公众的精神气质，以此压缩网络民粹主义行为存在的价值空间。

**分离主义有其历史根源，又有新的因素刺激，需要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内部被长期压制的民族种族冲突逐渐释放，加之欧美国家肆意干涉、破坏他国主权领土完整，以及近期难民涌入、恐怖主义和债务危机等新因素刺激，让分离主义势力成为影响整个国际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需要国际社会合作应对。首先，要防止分离主义思潮扩散到其他地区，造成其他地区和国际局势的整体动荡不安。其次，已经遭遇分离主义危机的欧美国家应该吸取教训，妥善评论、谨慎对待其他多民族国家存在的分离主义问题，停止肆意对外干涉，尊重他国的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摒弃在分离问题上的双重标准，避免不当言行进一步激化本国分离势力。

**走出种族对立的身份政治框架，切实提升全球化背景下移民问题的治理能力。**不可否认，2017年的难民问题和移民问题让欧美国家的种族主义、排外主义甚至恐怖主义等社会危机集中爆发，但难民和移民问题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机会和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回避了利益分配优势方应付的责任，对应该通过治理解决的问题提出了非常敷衍的解决方案。欧洲的难民危机及继发的种族对立反映了难民和移民问题的治理困境，国际社会应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首先，深化应对全球移民问题的国际合作框架机制。原有的移民问题治理深度不够，很多会议机制流于表面形式，造成了民族国家、区域组织、国际社会沟通互动不足。其次，减少国际法和国内法冲突，让国家治理难民的行动不再失范。虽然国际社会推动形成了关于难民



保护的若干公约宣言，保护其作为平等的个体自由迁徙的权利，但难民的流入国出于安全考虑则会限制其大规模进入。最后，建立统一有效的甄别机制，识别非法移民和极端主义势力。如果将大规模涌入的种族定义为难民，出于人道主义原则国家无权拒绝，但如果定义成移民，则可以通过移民管理政策加以限制。

**国家贫困和世俗教育缺失是滋生极端主义思想的温床，需要综合采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手段，多管齐下，标本兼治。**目前来看，国家贫困和教育缺失是滋生极端主义思想的主要温床，大国的不当干涉激发了伊斯兰国家民众的反美、反西方情绪，让没有工作、教育缺失的青年人成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高发人群。因此，在推进国际反恐斗争的同时，着手解决地区争端，减少国家间的发展不平衡，改善贫困人口收入状况和就业状况、提高世俗化教育水平，是解决问题的长远之道。大力清除极端主义的思想教育根源，必须要促进伊斯兰国家和社会现代化进程，推动对伊斯兰教经典的和平解读和理解，隔断极端组织与极端分子对伊斯兰教教义的歪曲理解，塑造伊斯兰教良好的正面形象。

**逆全球化思潮由理念逐渐转向政策和行动，中国应积极宣传回击逆全球化思潮的中国方案。**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没有迎来理想的复苏，反而陷入持续的结构性的低迷，刺激了发达国家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的逆全球化思潮。当前，逆全球化思潮已走向现实化、政策化，中国应该积极宣传回击逆全球化的中国方案。首先，引导公众理性认知全球化过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虽然它存在诸多不足，但其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传播、扩大了国家间交往。全球问题并非内生于全球化，反而多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予以解决的问题。其次，积极采取行动应对西方国家逆全球化思潮蔓延带来的挑战。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趋

势表明，世界经济进入了全球化模式的转变时期，当代的全球化进程将逐渐由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动力。推动世界经济开放发展和强劲复苏，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的责任担当。中国应大力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在全球经济格局变化中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发言权；提供丰富的公共产品和合作机制，推动全球治理的转型。

## 【重点解读】

# 民粹主义对世界政治秩序的新挑战

李靖堃

## 2017 年民粹主义继续扩散，但在不同地区表现不同

拉丁美洲曾经是民粹主义最为盛行的地区之一，典型的如上个世纪的“庇隆主义”和后来的“查韦斯主义”，但在 2011 年后，民粹主义在拉丁美洲逐渐开始衰退。而在世界其他地区，民粹主义则有上升的趋势，并在 2017 年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动态。当然，其在不同地区的具体表现并不完全相同。

在亚洲，民粹主义的影响并不像欧美地区那样强烈，但其在东南亚地区却表现得比较突出，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政治宗教化倾向愈发强烈。伴随着穆斯林强硬派的崛起，以排外为主要特征的民族主义开始泛滥，比如，菲律宾一些舆论提出了“菲律宾优先”的口号、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无端指责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是“经济殖民主义”等。

素来被誉为世外桃源的大洋洲，也未能免于民粹主义的影响，尽管相较于欧美国家，民粹主义在该地区的力量还较弱。继 2016 年澳大利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单一民族党在参议院获得 4 个议席后，在 2017 年新西兰的议会选举中，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新西兰优先党获得了 7.5% 的选票、9 个议席，成为第三大党，并与工党联合组阁，成功进入政府。

欧洲是民粹主义的主要“阵地”和“风向标”，也是频繁发生“黑天鹅”事件的地区。2017 年是欧洲的“大选年”，包括德国、法国和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举行了大选，而民粹主义政党在这些选举中大

多表现不俗，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洲未来的政治形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政治秩序。

### 欧洲民粹主义政党表现依旧突出，影响力不容忽视

对于欧洲主流政党而言，2017年可谓是喜忧参半。从总体上看，在欧洲大多数国家选举中，并未出现重大“黑天鹅”事件或严重动荡，传统中间派政党成功“阻击”了民粹主义政党，继续在政坛上占主导地位。在德国，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仍然稳居前两位，默克尔也第四次连任总理；在法国总统选举中，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最终击败玛丽娜·勒庞；在荷兰、奥地利、冰岛等国家的选举中，第一大党也均为传统中间派政党。这样的结果令全世界对民粹主义持警惕和戒备态度的人们都松了一口气，有评论甚至认为这意味着民粹主义的影响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是其开始衰退的转折点。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一下选举的各项数据，恐怕就无法如此乐观。

在2017年欧洲各国大选结束后，民粹主义政党以前所未有的数量或速度进入了国家议会或政府。在德国，选择党赢得592万张选票（得票率12.9%），比2013年多了将近450万张。选择党一跃成为德国第三大党，这是二战以后首次有民粹主义政党进入德国联邦议会。在法国，尽管玛丽娜·勒庞没能当选总统，但以“国民阵线”和“不屈法国”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政党都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它们从长期处于政治边缘一跃跻身于法国政治舞台的中央。在荷兰和奥地利，民粹主义政党均成为各自国家的第二大党，特别是在奥地利，自由党在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仅比第一大党人民党少4个百分点。在冰岛，民粹主义政党人民党首次进入议会。而在捷克议会选举中，前财政部长巴比什领导的“不满公民行动”获得200个议席中的78席，成为第一大党。与此同时，海盗党也跃升成为捷克第三大党，在4个欧洲国家（德国、瑞典、冰岛和捷克）都拥有了议席。

综上所述，2017 年欧洲多个民粹主义政党在民众支持率（以得票率为衡量）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纷纷进入议会，甚至有一些已经或即将成为执政党（或执政联盟中的一员）。可以说，这是民粹主义在二战结束以来取得的最好成绩。尽管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还不足以成为多数党，但在传统主流政党支持率不断下降的背景下，民粹主义政党的得票率已经足以对欧洲国家政策乃至欧洲传统政治秩序产生重大影响。

### **民粹主义的上升凸显并加剧政治裂痕，对政治秩序形成新挑战**

当前，民粹主义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特别是在某些欧洲国家处于“上升期”，这凸显和加剧了国家内部的政治裂痕，对既有的政治结构和政治秩序形成了新的挑战。

首先，导致组阁困难。在多个欧洲国家，由于民粹主义政党吸引了更多选民的支持，“抢走”了主流政党原有的一些议席，导致政党政治版图的碎片化趋势更加明显，传统主流政党或者首次失去绝对优势地位，或者优势地位迅速下降。特别是在德国，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在 2017 年总统选举中的得票率都创下了二战以来的最差纪录，而进入联邦议会的政党数量则达到了历史新高。在荷兰，共有 13 个政党进入议会，是二战后进入议会政党数量最多的一次。这种碎片化的加剧，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组阁困难，比如德国在大选结束 3 个月后仍未能产生新的联合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导致国家政策推行难度加大，甚至导致政局不稳。

其次，在民粹主义的冲击下，欧洲各国原有的、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可能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原有的“共识政治”正在被打破。更严重的是，在民粹主义的影响下，原来占统治地位的“共识政治”有向“对立政治”和“极化政治”方向发展的趋势，不同党派、不同地区之间的政治裂痕更加清晰，其中最明显的是在德

国和法国。在德国，从大选数据中可以发现，选择党的支持者更集中于东部（即原来的东德），它在全国的得票率为 12.9%，在德国东部的得票率却高达 20.5%。而在法国，尽管“国民阵线”前领袖勒庞在总统选举中落败，但她在第二轮投票中获得了将近 34% 的选票。支持勒庞的选民主要是低收入群体，大部分来自工业衰落的法国北部、东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同时，法国南部选民由于对难民问题的敏感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支持勒庞。与此相反，马克龙代表的是精英群体，其对欧盟和全球化持开放态度。由此可见，以“国民阵线”为代表的民粹主义已经“成功”地将法国划出了一道难以弥合的政治鸿沟，而这两种立场似乎不可调和。主流政党如果无法找到缓解矛盾的有效方法，那么，在民粹主义的压力下，就有可能吸收后者的政策主张，从而造成主流政党的“民粹化”和“极端化”，对传统政治意识形态产生破坏性影响。

最后，在新的形势下，民粹主义与狭隘的“自我利益”相结合，被地方分离势力所利用，加大了一些国家内部的分离倾向，甚至造成国家分裂的风险，这也是很多国家当前面临的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比如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分离倾向长期存在，而在民粹主义盛行的背景下，地方分离主义与民粹主义结合在一起，获得了新“动力”，形成了“分离民粹主义”，甚至威胁到了西班牙的国家统一。在欧洲以外的中东地区，尽管遭到中央政府和欧盟等第三方的反对，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仍然举行了独立公投。

### **民粹主义影响外溢，将对全球化与世界秩序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

除了国家内部，国家之间的政治裂痕也在加剧，这在东西欧之间表现得尤其明显。相较于西欧，民粹主义政党在中东欧地区的影响要更加强大，比如，已经取得执政地位的匈牙利的青年民主主义者

联盟、波兰的法律和正义党、捷克的“不满公民行动”等。这些政党对欧洲一体化或欧元多持消极态度，希望保持本国主权，反对欧盟被德法等大国主导，而且持反移民立场，不同意接收难民。除难民问题之外，中东欧国家还在其他很多问题上与欧盟“唱反调”，反对欧洲一体化向更深入的方向发展，导致中东欧国家与欧盟及其他西欧成员国之间的离心力日益加剧。事实上，在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双方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和谐“蜜月期”，但随着民粹主义的兴起，似乎东西欧之间再次竖起了一道“铁幕”，而这背后的原因是双方在民主、法治等价值观问题上的深层矛盾。

在国际层面，由于绝大多数民粹主义政党都与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相伴而生，因此在特定的背景下，有可能形成“民族民粹主义”，即假借人民的名义，行种族排外之实。2017年，土耳其、埃及、俄罗斯、法国、德国、英国和西班牙等国家频繁遭受恐怖袭击，而人们往往将恐袭事件与难民或移民问题联系起来，从而激发了“民族民粹主义”情绪的不断上涨，在大量难民涌入欧洲的情况下这种情绪尤其明显，民粹主义政党恰恰是利用了这种情绪，赢得了高支持率。而在民粹主义激进移民政策的压力下，很多国家的主流政党和政府不得不考虑收紧移民政策。在德国，选择党进入议会将迫使执政的中间派政党不得不考虑民众的反移民立场，默克尔竞选时在移民政策方面已经表露出了明显的“右转”倾向。在奥地利，人民党和自由党均持反移民立场，而塞巴斯蒂安·库尔茨在担任外长期间，就曾支持堵塞难民进入欧洲的通道。如果多个欧洲国家均出现强烈的反移民情绪，那么也不能完全排除欧盟未来的移民政策会发生改变的可能性。如果这种趋势进一步发酵，并外溢到更广泛的国际关系领域，其危害性不言而喻，将对全球化与世界秩序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

在可预见的将来，民粹主义的影响在短期内不可能消失，特别是当下民粹主义在很多国家的“成功”，很容易起到示范和鼓励作用，从而使民粹主义效应外溢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一般情况下，一个政党从成立到进入议会需要较长时间，但如今多个民粹主义政党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都较短。比如，成立于 2014 年的西班牙“我们可以”党成立两年就已进入议会，而且成为第三大党；德国选择党和意大利“五星运动”均仅用了 4 年时间；捷克海盗党也只用了 8 年时间。某个或某些民粹主义政党“昙花一现”的现象是可能的，也并不意外，但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或意识形态的影响势必长期存在。如果不能消除民粹主义产生的根源，即社会和经济利益分配不平等问题，民粹主义就不可能消失。而且，在时机适当的情况下，民粹主义甚至会对既有政治格局和政治秩序形成严峻挑战，这才是西方政治目前面临的最棘手问题。

可以预料，在民粹主义不断发展的情况下，2018 年的世界形势仍然不会太过平静。在欧洲，意大利、匈牙利、拉脱维亚和塞浦路斯均将举行议会选举，如果不出现重大意外事件，匈牙利现执政党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将获得连任，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后的欧尔班·维克托将极有可能采取更加激进的反移民、反欧洲一体化措施，从而对欧洲其他国家的议会选举产生一定的“连锁效应”。在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领导的意大利力量党和反建制政党“五星运动”异军突起，与执政党民主党的民调支持率不相上下，势必对意大利未来的政局造成严重冲击。而在拉丁美洲，由于 2018—2019 年将有十几个国家举行议会或总统选举，因此这两年将十分关键。尽管目前居于民调首位的几乎都是中间派候选人，但不能完全排除民粹主义候选人回归的可能性。



# 分离主义威胁欧洲稳定与发展

赵怀普

欧洲近年来因深陷多重危机与挑战而备受国际社会关注。2017年对于欧洲而言仍是多事之秋，虽然法、德两国大选未爆出新的“黑天鹅事件”，近期来势凶猛的民粹主义得到了一定遏制，欧洲经济特别是欧元区经济也继续保持了温和增长势头，但欧洲所面临的困扰和挑战仍然很多。除了“独狼式”恐怖袭击事件频发、英国“脱欧”谈判难题未解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以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为代表的分离主义在欧洲多国的抬头，其发展不仅给所在国造成了政治动荡和社会不稳定，危及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而且也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欧盟内部团结构成了严峻挑战。

## 2017年欧洲分离主义范围广、声势大、影响深

分离主义 (separatism) 是由一国国内某一少数民族群 (往往拥有独有的文化、集体认同) 单方面推动的，要求从所在主权国家分离出去、独立建国的行为。由于分离主义是单方面的行为，而非经过和平协商与谈判程序达成协议转移主权或成立自己独立国家的行为，也不是非殖民化情况下的民族独立行为，因而其分离的要求并不为当事国政府所接受。

分离主义在欧洲是一个历史问题，欧洲多国都曾面临分离主义的威胁。例如，1946年9月14日，丹麦法罗群岛的部分居民就“是否继续与丹麦王国保持联系”发起了独立公投，虽未获得独立，但法罗群岛成为享有高度自治权的丹麦领地。据悉，法罗群岛将于2018年4月确认是否需要公投独立。2014年9月，英国的苏格兰曾就是否脱离英国而举行过全民公投，结果以苏格兰继续留在联合王国告终。苏格兰独立公投在欧洲引发了“蝴蝶效应”。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巴伐

利亚党对苏格兰独立公投持支持态度，并视之为典范。法国科西嘉岛的“自由科西嘉”党领导人也表示，苏格兰独立公投激励着科西嘉争取独立，科西嘉也将谋求类似的独立公投。

2016 年英国公投脱欧震惊了欧洲，也进一步刺激了欧洲国家内部的分离主义势力。2017 年 3 月英国上议院通过“脱欧法案”之后，苏格兰地区的分离主义势力便宣布：希望 2018 年再度发起全民公投，以决定苏格兰是否继续留在英国。与此同时，北爱尔兰的民族主义政党“新芬党”也声称希望北爱尔兰能进行独立公投。动静最大的当属加泰罗尼亚的公投行动。2017 年 10 月 1 日，位于西班牙东北部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毫不理会西班牙政府和议会的反对，举行了独立公投。西班牙政府对于公投独立的结果不予承认，并向加泰罗尼亚派出了国民警卫队进行执法。10 月 27 日加泰自治区政府宣布独立后，西班牙政府于次日发布公告，称西班牙中央政府将正式接管加泰自治区，同时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宣布解除加泰自治区主席普伊格德蒙特的职务。喧嚣一时的独立公投在闹腾了一个月后，最终在 10 月 30 日以失败告终。11 月 5 日，逃亡比利时的“独立”领袖普伊格德蒙特向比利时警方自首。普伊格德蒙特承认，自治区政府对加泰罗尼亚局势作出了错误判断，他原以为中央政府会与自治区政府就独立路线图展开谈判，然而这一切却没有成为现实。除加泰罗尼亚地区外，西班牙东北部与法国接壤的巴斯克地区，是西班牙境内分离主义活动又一较为猖獗的地区。意大利国内的分离主义也有新发展。2017 年 10 月 22 日，意大利北部富裕的威尼托和伦巴第两区举行了公投，结果是以压倒性票数支持从中央政府手中获得在财政和行政方面更多的自治权。此外，比利时国内分离主义势力抬头也引起广泛关注。

2017 年欧洲分离主义的发展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范围广、声势大、影响深，分离主义势力的抬头在欧洲多国引起连锁反应，对欧洲

造成了强烈冲击；二是分离主义运动活跃的地区大多相对富裕，如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意大利的威尼托和伦巴第两区和比利时的弗莱芒地区；三是分离主义运动均采取独立公投的形式表达其政治诉求。

## 分离主义在欧洲泛滥的背景与原因

近年来欧洲分离主义的抬头、泛滥，有着深刻复杂的背景和原因。首先，冷战后世界上一些国家内部曾长期被抑制的民族种族矛盾，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自治区之间的矛盾开始迸发出来，而欧美肆意干涉、破坏他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行径，间接地鼓励了欧洲国家内部的分离主义势力。上世纪 90 年代，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民族宗教冲突加剧、分离主义泛滥，导致了欧美的军事干涉。1999 年 3 月，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美国领导的北约以“防止科索沃人道主义危机”的名义，对南联盟实施了长达 78 天的空中打击。同年 6 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的第 1244 号决议，规定南联盟对科索沃地区拥有主权，由联合国特派团对科索沃进行管理，北约领导的国际维和部队在科索沃提供安全保障。然而在美欧的扶持下，科索沃于 2008 年 2 月正式宣布独立。欧盟追随美国制造了南斯拉夫的解体，继而又支持科索沃独立，这一行为间接地鼓励了欧盟国家内部的分离主义势力，为其日后的猖獗、泛滥埋下了隐患。

其次，近年来全球化的一些负面效应凸显，反全球化思潮和民粹主义在欧美日渐抬头，其在给欧美政坛造成强烈冲击的同时，也使欧洲分离主义势力受到进一步鼓舞。英国脱欧公投及其结果，更是为欧洲的民粹主义势力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尽管在 2017 年的荷兰、法国、德国大选中，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并未获得执政权，但其势力在欧洲的壮大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反欧盟、反穆斯林、反全球化等，是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几大共性。其中，反欧盟这一点强调的是欧

盟成员国与欧盟的分离。在经济、社会领域一部分主权已让渡于欧盟的情况下，脱离欧盟体现出的是维护自身各方面切实利益、收回相关领域的自主权、抗拒欧盟直接干涉的诉求。这一点与分离主义要求实现在政治、经济等领域自治的愿望相吻合。因此，欧洲和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势力的壮大，从侧面鼓励了分离主义势力。

再次，欧盟近年来遭受的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威胁和主权债务危机等，也助长了欧洲的分离主义势力。为了应对欧债危机，欧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启动“欧洲学期机制”、签署《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与治理公约》、推出欧洲央行的“无限购债计划”等。随着这些措施的出台和落实，欧盟的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与发展，但总体而言尚未完全走出欧债危机的阴霾。欧债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与一些国家内部的治理问题相互交织，助长了分离主义分子的不满情绪。

最后，还应从国内经济、政治等角度分析分离主义在欧洲抬头的原由。在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拥有独立愿望的地区与所在国的其他地区之间存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如闹独立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人口约 750 万，占全国总人口的 16%，是西班牙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其经济总量约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在此次独立公投中，当地民众非常不满“加泰罗尼亚的钱被马德里拿去补贴其他地区”，这是分离主义分子挑动民众支持独立的理由之一。从政治上看，分离主义猖獗的地区普遍存在中央政府与自治区之间权力分配不均的问题。在此次被中央政府正式接管之前，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曾是西班牙国内自治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拥有本区专属的议会和内阁、警察、公共广播机构、交通设施等，但外交事务、军队和财政政策的权力却由西班牙中央政府掌控。对中央与本自治区之间权力分配的不满，是导致加泰罗尼亚地区分离主义高涨的原因之一。另外，独特的语言文化

也是造成某些国家内部分离主义存在与发展的原因之一。例如，加泰罗尼亚拥有自成体系的加泰罗尼亚语和西班牙语两种官方语言，在文化发展的历程中一直注重保持自身的文化特性。自 15 世纪被并入西班牙之后，加泰罗尼亚人一直未曾放弃寻求独立的愿望，独立意识较其他地区更为鲜明。

### **分离主义对欧洲的威胁甚至比难民危机更严重**

新一轮的欧洲分离主义浪潮来势汹汹、此起彼伏，强烈地震荡与冲击着存在分离主义势力的欧洲各国、欧盟乃至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其对欧洲的威胁甚至比难民危机更严重。

分离主义当事国首当其冲。事实与经验表明，分离主义通常会造造成追求独立地区的经济动荡，削弱所在国的经济实力。如西班牙经济部长警告：如果加泰罗尼亚执意独立，那么后者经济将萎缩 25%—30%，失业率翻番。分离主义势力的目标一旦实现，也将会削弱所在国的经济实力。诸如加泰罗尼亚、伦巴第和威尼托等都是所在国经济发展相对发达的地区，倘若被分离出去，那么所在国的总体经济实力将遭受巨大损失。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危害同样突出。分离主义在同一地区的不同民族之间制造矛盾纠纷，将影响所在地区和所在国的社会政治稳定，撕裂社会，造成族群对立、中央与地方关系紧张，对国家统一构成威胁。

分离主义的抬头也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欧盟的发展构成了挑战。面对分离主义运动在欧洲多国的迸发，欧盟将不得不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来应对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在尚未走出欧债危机阴霾、恐怖主义威胁、难民危机困扰的背景之下，这意味着欧盟将在经济、政治、防务等领域承受更大的压力，欧洲一体化在各领域的发展都将受到制约。分离主义运动阻碍了欧盟的发展，损坏了欧盟软实力及其国际形象，也削弱了欧盟的国际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分离主义的抬头也会间接鼓励世界其他一些地区和国家的分离主义。分离主义运动和分离倾向在世界多国都有所体现，如加拿大的魁北克、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尼日利亚的比夫拉等。日渐泛滥的欧洲分离主义运动若不能被有效遏制，或有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造成多国经济与政治动荡，威胁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欧洲分离主义本有其历史渊源，近年来又受到新的因素刺激，因而在短期内难以从根本上消除，甚至不排除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美国家政府应深刻认识欧洲分离主义思潮及其分离运动的危害性，认真看待其已经造成和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并采取积极措施有效应对其威胁和风险。存在分离主义势力的欧洲各国，对内应促进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与利益平衡，沟通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自治区之间的权力关系，构建不同种族、民族、族群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增强国家认同和命运共同体意识；对外，欧美国家政府应吸取教训，妥善看待和谨慎对待世界上很多国家存在的分离主义问题，停止肆意对外干涉，尊重他国的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摒弃在分离主义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欧美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应树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合作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的均衡发展，从根本上遏制分离主义思潮及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

# 欧美种族主义何去何从

王义桅

种族主义是人类发展史上产生的最丑恶的观念之一，其凭借肤色、血缘等似是而非的种族特征肆意剥夺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权利，并为建立一种所谓“优等种族”统治“劣等种族”的秩序体系提供合法性依据。自联合国 1965 年通过《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以来，任何以生物特征为基础的种族间不平等论述都不再被视为合理，但这并不意味着种族主义的消亡。

2017 年我们见证了诸多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事件：1 月 27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在 120 天内限制难民入境美国，在 90 天内限制七个伊斯兰教国家人口进入美国，并无限期禁止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8 月 12 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围绕南北战争时期南军李将军铜像的拆除问题，白人至上主义群体和反种族主义群体间发生冲突；11 月 11 日，波兰独立日大游行中出现具有反犹和反伊斯兰成分的歌曲，并且一些游行手持暗含白人至上主义的旗帜。通过这些代表性事件，我们发现种族主义在一些西方民众中依旧有市场，而且有些种族主义行为似乎并不符合种族主义的经典界定。因此，必须理清种族主义在当代面临的新环境，进而对种族主义的新手段有所认识，对其带来的新危机有所察觉，并把握住其未来发展的新动向。

## 种族主义沉渣泛起的新环境：难民危机、逆向歧视与民粹运动

法国思想家塔吉耶夫（Pierre-Andre Taguieff）在《种族主义源流》一书中，对种族主义思潮的当代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当代种族主义已经从基于生物进化论和不平等主义两大基本特征的生物性种族主义，发展为鼓吹“文化间差异的绝对化”的文化性种

族主义。因此，战后西方国家普遍实施的文化多元主义所主张的差别权和文化相对论，反而变相成为种族主义的工具。在此基础上，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实现了合流，形成的种族民族主义既不需要“种族”概念的存在，也不需要设定优劣种族的等级规范，成为一种“没有种族的种族主义”或“新种族主义”。

近年来，“有利”的环境因素为种族主义提供了借尸还魂的重要基础，包括持续多年的国际难民危机、旨在实现结果平等的逆向歧视和甚嚣尘上的民粹主义运动。

当代西方国家所谈之难民问题，是指 2010 年以来因“阿拉伯之春”、“伊斯兰国”崛起、叙利亚危机等中东北非地区的政治与社会动荡而导致的人口外迁。2015 年春夏，大量难民开始涌入欧洲，当年涌入欧洲的难民总数达 100 万之巨，导致难民危机的真正爆发。对于欧洲各国来说，难民危机的棘手之处在于：首先，难民的数量十分巨大；其次，抵达欧洲并提交难民申请的移民中，有部分属于不符合难民条件的经济移民。难民潮带来的巨大道义与社会经济压力已经显现，直接表现为一些中东欧国家拒绝难民安置配额，并以关闭边境的方式拒绝穆斯林难民入境。如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联盟领袖巴耶尔便耸人听闻地将穆斯林难民种族化，视其为阴谋改变欧洲宗教与民族构成的种族武器；匈牙利首相欧尔班则直接给穆斯林难民贴上带来恐怖主义和潜在犯罪人口的标签。对于美国而言，久治不愈的非法移民问题也在 2016 年总统竞选期间持续发酵。特朗普总统上任伊始，最先兑现的承诺便是签署限制难民入境的行政命令，而其为了治理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推动建设边境隔离墙、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增强相关移民法案的执法力量。2017 年上半年，美国移民及边界执法局逮捕了 41318 人，比去年同期增长 36%。特朗普对非法移民和难民的零容忍态度，一方面有助于解决一些移民带来的犯罪问题，但另一方面也



恶化了美国国内原本就十分紧张的种族关系，美国执法部门带着有色眼镜怀疑、骚扰拉丁裔、黑人和亚裔的事件发生更加频繁。

难民危机使西方国家政府面临移民准入和种族融合的窘境，而一些不合理的反种族歧视措施则可能导致“逆向歧视”，反而加剧了种族关系的紧张。美国自废除种族隔离以来，为了纠正种族主义制度下长期形成的以种族划分的阶层界限，主张实施“平权政策”，或者称为“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其主张在教育和就业层面照顾少数族裔和特殊群体，但在实践中往往被简单处理为定额制，即要确保在最终的结果中形成包括各个种族的固定分配比例。这种种族因素占据重要地位的社会资源分配制度，致使白人以及优秀的少数族裔成员在社会中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获得与其他族裔同等的教育机会与职位，因而被认为是传统种族歧视的逆向重现。2017年，美国司法部开始对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常春藤名校涉嫌依据种族配额歧视亚裔学生进行调查，这一行动可以被视为特朗普总统为消除“逆向歧视”、回报中下层白人选民而做出的努力，但消除因激进的种族补偿政策而产生的“逆向歧视”，尚需时日。

此外，难民与非法移民的涌入、歧视性的平权法案为右翼民粹主义运动提供了实施政治动员的资本，也带来了民粹主义运动背景领导人的涌现，比如法国国民阵线的勒庞（Marine Le Pen）继承其父亲的政治衣钵，将国民阵线改造成反移民、反欧盟但支持民主制和法国民族国家体制的新型右翼政党，获得了饱受移民问题困扰的法国南部民众的广泛支持。

### 种族主义工具化的新危机：从文化种族主义到生物种族主义的回潮

尽管种族主义已经进入以文化差异替代种族优劣的阶段，但作为政治斗争工具使用的文化种族主义，在民粹主义运动的支持者群体中，依旧存在退回到生物性种族主义层面的危险。

撕开生物性种族主义禁忌的是美国夏洛茨维尔市的种族主义骚乱。就其发生而言，夏洛茨维尔骚乱不过是重演了美国历史上间歇发生的种族骚乱剧本，但其特殊性又不容忽视。更为严重的是，美国政府在同期批准特赦了被右翼视为英雄的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郡前警长乔·阿尔帕约。阿尔帕约以敌视拉美裔闻名于世，其在任期间不仅用恶劣的条件关押非法移民，而且默许其警员按种族特征缉拿无证移民，涉嫌种族骚扰，并最终被法院判定有罪。特朗兰特赦阿尔帕约的行为，变相支持了美国国内的种族仇恨团体，鼓励其突破现有政治禁忌、重返生物性种族主义的老路。

欧洲在这一问题上并不比美国好多少。难民危机的加剧，使欧洲本土白人族群越来越需要诉诸简单粗暴的种族主义话语、展示种族主义标志和参与极右翼游行，以发泄其对多元文化主义移民政策日积月累的怨怒。如波兰的独立日游行，逐年演变为一场右翼极端思想的大展示，甚至在2017年演变成一场种族主义情绪的宣泄。

### **种族主义思潮未来的新动向：走出种族对立的身份政治框架，任重而道远**

种族主义思潮的未来发展趋势既呈现出希望，也存在危机。一方面，当前席卷欧美的新种族主义思潮与民粹运动依旧是在现有体制内部行动，表现为一种体制内的变革力量，因而其不可避免地受到制衡，其观念和政治纲领也不得不寻求妥协以获得最终实施，因而种族主义思潮在短期内的破坏力是可控的；另一方面，种族主义以身份政治的面孔出现后，其同具体的政治与经济利益相联系，成为政客相互攻讦和为利益分配政策的合法性背书的工具，这又使其成为了社会矛盾的制造者。

首先，当代欧美种族主义在难民危机与民粹运动的潮流下复苏，体制性力量依旧能够有效约束其影响。这一体制内约束包括选民的制

约、政治体制内部力量权衡和文化多元主义政策在教育领域产生的长远影响。选民的制约主要表现在议会民主体制盛行的欧洲。基于惨痛的历史教训，传统种族主义并不是一个动员欧洲选民的有效路径。即便存在荷兰自由党主席维尔德斯这样以种族歧视和排外主义为噱头的政客，但欧洲政治中的种族主义多以文化差异与冲突问题展现。奥地利人民党在 2017 年 10 月大选中的胜利表明，反对非法移民但非极端排外与种族歧视，才是最符合欧洲当前民意的政治纲领。

政治体制内部力量权衡在美国表露无遗。特朗普在 2017 年初签署的关于限制难民与七个伊斯兰教国家人口入境的行政命令，便因在华盛顿州法院裁定违宪和多个州府的相应法律行动而陷于停滞，直到 2017 年 6 月才获最高法院批准“部分实施”。此外，其撤销奥巴马医疗法案、修筑边境隔离墙等涉嫌白人种族主义色彩的政策也屡屡受阻。在充满争议的特赦阿尔帕约事件发生后，共和党也发表了对白人至上主义、新纳粹主义等右翼仇恨组织的谴责。

文化多元主义政策虽然就其初衷而言并不成功，但的确使越来越多年轻人接受更加多元、宽容与平等的种族观。夏洛茨维尔骚乱虽然与种族问题相关，但是并非种族间的暴乱。夏洛茨维尔并非有色人种聚居的地域，案件中也不存在明确的白人压迫者与有色人种受害者的角色建构，反种族主义群体成分的多样性使得夏洛茨维尔骚乱超越了种族斗争的范畴。

其次，约束力量的存在，并不能掩盖身份政治框架为种族对立所俘获，并成为争议性社会政策合法性来源的窘境。以种族、性别、宗教为代表的身份政治，原本是少数族群、受压迫族群实现群体动员、获得平等政治地位和应有权益的身份解放行为，但身份政治是一把双刃剑：对独特身份的追求会无限扩张到对偏向自身的有利社会安

排的心安理得，身份政治活动及其话语框架，日渐成为各种围绕身份特质而动员形成的社会群体间对抗、竞争的政治工具。

以种族为核心身份要素的身份政治框架，在不同时期为不同社会制度安排提供了合理性：美国对黑人与其他有色人种的排斥与种族隔离，是为种植园奴隶制或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白人群体独享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力的社会安排提供合法性依据；“平权政策”则以激进而僵化的结果平等形态，弥补种族主义对有色人种权益的长期损害；“单一民族理念”为法国对同时具有外来民族和种族属性的罗姆人的驱逐政策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此外，种族主义的这一身份政治功能早已具有全球治理意义：首先，其回避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与社会作为利益分配的优势一方所应负的责任，将关注点引向难民自身文化同东道国社会文化体系不相容的问题；其次，种族主义还被用来为一些全球性问题提出敷衍的解决方案，如用恐怖主义标签将穆斯林群体污名化、用罪犯的标签描述拉丁裔和罗姆人，以此为一些简单粗暴的排外行为提供合法性。走出这种极端的身份政治框架，任重而道远。

# 极端主义的威胁与危害

周永生

## 恐怖主义在世界各地蔓延

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当中的一大毒瘤，威胁着世界各地、各个国家的安宁生活。以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为标志，全球进入了恐怖袭击频发时期。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以反恐名义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由其参与和支持的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等。但这些战争不仅没有粉碎国际恐怖主义，反而导致恐怖主义势力的集结与扩散。

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猖獗一时的恐怖势力“伊斯兰国”（ISIS）武装遭到国际反恐力量的多方围剿，其地盘日益萎缩，不断陷于失败当中。2017年11月至12月，叙利亚、伊拉克等国政府宣布消灭“伊斯兰国”武装的政权化存在。残存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陆续逃离以叙利亚和伊拉克为核心的有形战场，有的化整为零，散落到当地；有的以难民形式渗入到欧洲；有的进入非洲地区；有的通过其他多种渠道流入世界各地，导致恐怖主义势力在世界各地的进一步扩大与蔓延。2017年5月，菲律宾马拉维市爆发的恐怖袭击，导致该市陷入大规模长期战争当中，这是当地恐怖主义分子与“伊斯兰国”结合以后发动的恐怖主义战争。这种恐怖主义的威胁、杀戮和战争，毫无疑问是对正常国家和社会秩序的破坏，值得各国政府和社会警醒和反思。

## 极端原教旨主义是恐怖主义产生的重要源头

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会出现恐怖主义行为日趋扩展的势头呢？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者强势扩张，他们侵略亚非拉弱势国家和地区，以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改造同化当地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当地对西方制度、文化，有融合吸收，也有冲突对抗。在与西方

文化的冲突、对抗中，各种文化、各大传统宗教都有不同程度的原教旨主义倾向。

一般来说，原教旨主义，就是要固守某种文化、宗教的传统，和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等，抗拒自由主义对其文化传统的世俗化改造和解构。这属于一种信仰原则，及其附带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等，并没有好坏、优劣、对错的差别。19世纪20年代期间，美国就曾经出现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但是，由于整个美国社会崇尚自由，世俗化的精神十分浓重，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并没有很大的市场，因此没有表现出与国家社会发展明显的矛盾与冲突。

而在伊斯兰世界，一些原教旨主义者则由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干涉主义和文化输出，逐步演变为近现代化进程的强烈矛盾、对抗，甚至冲突。伊朗、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等主要伊斯兰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某些原教旨主义的社会特征。有些世俗化的伊斯兰国家，即使带有某种原教旨主义的特征，也遭到原教旨主义者的攻击，认为当权者已经堕落，因为他们远远达不到虔诚的原教旨主义者所要求的程度。一些比较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为了实现原教旨主义的理想和目标，往往不惜进行暴力革命，不惜进行流血战争，不惜推翻世俗的伊斯兰政权。当面临军事实力不对称时，这种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潮就催生了专门杀伤软目标的恐怖主义。

为了迷惑大众并给自己的行为找到合法性与正当性，部分极端组织对《古兰经》等伊斯兰经典进行断章取义式的解读和故意误读，鼓动进行所谓“圣战”，并做出有组织、有计划的安排和实施，造成了层出不穷的恐怖袭击和恐怖事件，也引发舆论对伊斯兰教及其信众的误解、偏见乃至成见，进而加剧了对立情绪。可以说，一些比较极端的原教旨主义是恐怖主义产生的重要源头之一，恐怖主义是原教旨主义的极端发展。

## 宗教极端主义及其来源

宗教极端主义也称为极端宗教主义，是以“宗教至上”为名义的一种极端主义思想，其目的是要恢复神权在现代国家的统治地位，建立政教合一国家，实现神权专政。以“伊斯兰国”（ISIS）武装为例，他们鼓吹推翻世俗政府的腐朽统治，在全世界建立由哈里发指导的统一伊斯兰国家；为达此目的，必须进行“圣战”，乃至末日决战。他们以天国的思想诱惑普通群众，宣传杀死一个异教徒就可以直接上天堂。宗教极端主义成为恐怖主义集团和恐怖分子产生的直接温床。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宗教极端主义？原因十分复杂，但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属于思想根源，来自于对伊斯兰经典教义的歪曲理解；一类是源于特殊的政治经济和国际背景。从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开拓对亚非拉地区殖民活动以后，伊斯兰国家处于弱势地位和弱势状态，很多国家和地区，开始引入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但他们的经济状况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致使一些比较贫穷的伊斯兰地区宗教极端主义十分盛行。而某些伊斯兰石油富国，尽管他们的国民整体上比较富裕，不太可能因为贫穷而走上极端主义道路，但出于民族自尊心和宗教上的差异，对于美国的强势外交、强势的政治经济文化渗透十分不满。因此，在对宗教教义极端理解的基础上，其中的某些势力通过输出金钱和武器，支持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走上暴恐主义道路。这是宗教极端主义逐渐扩大与发展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根源。

## 消除极端主义威胁的对策

在恐怖主义肆虐的地区，极端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都和对伊斯兰教教义的极端理解有关，所以，消除极端主义成了世界主流社会的巨大难题。空洞地宣说消除极端主义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全球的

伊斯兰信众，已经从1990年的9亿人口，迅速扩展到了当前的16亿人口。这样巨大的宗教信仰群体的治理，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如果从政治正确的视角而言，我们当然也可以冠冕堂皇地说极端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都不是伊斯兰教。但了解这些极端思想的起源及其事件、人员、组织背后的因素，都不难发现其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极端主义组织或者个人在进行战争或者恐怖袭击时，一般都打着宗教的幌子，声称为安拉而死。暴恐组织在对其成员进行洗脑时，往往宣称为安拉圣战而死可以进入天堂。这些宣传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曲解或扭曲伊斯兰经典的成分。由于他们残暴的恐怖袭击有违伊斯兰反对滥杀无辜的教义，伊斯兰国家主流宗教人士普遍不承认他们的行为符合教法教义，而恐怖主义的最大受害群体恰恰是哪些无辜被伤害的穆斯林，无论是从统计学的人数考察，还是从传播学的形象伤害而言。可以认定，极端政治势力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惜劫持伊斯兰教之名，曲解甚至篡改教义。因此，促进伊斯兰国家和社会现代化进程，推动对伊斯兰教经典的正确解读和理解，恐怕是隔断极端组织与极端分子对伊斯兰教教义歪曲理解的重要前提，也有助于塑造伊斯兰教良好的正面形象。



## 2017 中东极端主义发展趋势

王锁劳

2017 年中东极端主义主要是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以下简称“伊斯兰国”）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所鼓吹、宣传和奉行的政治伊斯兰思想。2017 年中东极端主义的主要表现为：

**第一，“伊斯兰国”与“穆兄会”同流合污，制造了一系列恐怖大案。**“伊斯兰国”源于伊拉克“基地”组织，原“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的副手、现任“基地”组织最高领导人埃伊曼·扎瓦赫里曾是埃及“穆兄会”成员，深受“穆兄会”极端主义思想影响。近年来不少埃及“穆兄会”成员投靠“伊斯兰国”，在埃及西奈半岛发展和壮大。2017 年 11 月 24 日，位于西奈半岛北部的罗道清真寺遭到了恐怖分子的武装袭击，导致 305 名苏非派穆斯林死亡（含 27 名儿童）、128 人受伤，这是埃及历史上单次恐怖袭击造成伤亡人数最多的恶性案件。据埃及《金字塔报》公布的调查结果，策划此次恐怖袭击的主犯为穆罕默德·阿卜杜拉·达拉基，是“耶路撒冷辅士运动”的成员，而该组织于 2014 年 10 月向“伊斯兰国”宣誓效忠。

**第二，沙特、阿联酋、巴林、埃及等国家与卡塔尔断交，“穆兄会”的国际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穆兄会”成立于 1928 年，是阿拉伯国家最早的政治伊斯兰组织。2013 年 12 月 25 日，埃及“穆兄会”被埃及政府定性为恐怖主义组织。2017 年 6 月 5 日，沙特、阿联酋、巴林和埃及四国宣布与卡塔尔断交，指责卡塔尔“煽动、支持和武装恐怖分子”，并对卡塔尔实行空中、海上和陆地的边界制裁。

**第三，“伊斯兰国”节节败退，面临土崩瓦解。**在 2014 年 8 月 15 日通过的联合国安理会第 2170 号决议中，“伊斯兰国”“胜利阵线”被国际社会明确定性为鼓吹“暴力极端主义思想和行动”以及“采

用多种恐怖主义犯罪行为”的团体。“伊斯兰国”崇尚伊斯兰教早期清教徒式的生活，奉行“罢黜百家、唯我独尊”的极端主义思想路线，凡是与其有悖的任何宗教思想和行为，都被视为“异教徒”或“卡菲尔”，遭到排斥、禁止、毁灭、杀戮。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力量的参与下，伊拉克政府军和民兵于 2017 年取得了历史性胜利。2017 年 12 月 9 日，伊拉克总理海德尔·阿巴迪宣布已收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控制的所有领土。

随着“伊斯兰国”的灭亡，近年来极端主义肆虐和泛滥的局面可望得到有效遏制，但是距离彻底消灭还遥遥无期。即便“伊斯兰国”武装人员被彻底消灭，但也还有其他奉行极端主义思想的组织。因此，必须深入探析极端主义思想长期存在的根源，彻底瓦解极端主义思想。

**首先，是极端主义思想的教育根源。**中东除了以色列外都是穆斯林人口占主体的伊斯兰国家，中东国家非常重视宗教教育，与伊斯兰教相关的宗教课程从小学一直贯穿到大学。然而不少国家的宗教教材充满了暴力和对异教徒的歧视性内容。以埃及为例，伊斯兰教教材基本上为爱资哈尔组织专家所编写，内容较为保守和陈旧。2016 年 8 月，开罗大学文学院教授侯赛因·哈穆德呼吁对爱资哈尔教学大纲进行根本性改革，丢弃其中宣扬仇恨和暴力的内容。遗憾的是，这种相对理性的呼声过于弱小，难以达到目的。

**其次，欠发展和贫穷是滋生极端主义思想的重要温床。**中东国家除了以色列外，都是发展中国家。同时，中东除 OPEC 成员国、土耳其等较为富裕外，其他国家基本上都是经济欠发展的贫穷国家。此外，中东国家人口增长率较高，青年占总人口的比重很大，就业压力非常沉重。没有工作或失业的青年人很容易成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高发人群。

最后，美国偏袒以色列和欺压巴勒斯坦的外交政策，为中东极端主义思想火上浇油。从“基地”组织到“伊斯兰国”，其共同点是反美主义，表现为仇美、恨美、憎美。究其缘由，离不开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不公平政策。美国政府历来较为敌视穆斯林，2017年1月，美国政府通过了限制7个伊斯兰国家居民入境的“禁穆令”。2017年12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宣言，在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同时，拟将美国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此举无疑点燃了伊斯兰世界的怒火，激发了新一轮反美主义情绪和极端主义思想。长此以往，根除极端主义无疑是难上加难。

# 认清逆全球化思潮的谬误——不能把困扰世界的问题 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

冯维江

逆全球化 (deglobalization, 有时也被称为去全球化) 并非近年才有的现象。自从全球化的威力开始显现, 逆全球化的反弹也随之出现并逐渐加力。由于全球化往往并非是一个中性的过程, 所以通常是一些人不同程度、绝对或相对地得益, 而另一些人受损的过程。受损者主动或被人牵引着将损失归咎于全球化, 从而成为反对全球化的主力军, 逆全球化思潮也在这些人中间大行其道。因此有人将现代社会中的失败者或所谓“现代化输家”视作滋生逆全球化思潮的土壤, 不无道理。

## 逆全球化思潮的叙事逻辑

作为一种思潮的逆全球化, 是对全球化所提倡的“通过生产要素跨境流动、市场资源全球配置、国际规制普遍适用等产生更高效率”理念的反动。这种反动, 并非否认全球化能产生更高效率的事实, 而是认为这种高效率所助长的分配不公平所带来的损失, 超过了其所加持的生产上的高效益给人类带来的福利改善。用践踏还是追寻公平正义的二值逻辑来为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赋值, 极大地强化了逆全球化倾向者的道义使命感。

逆全球化思潮的叙事与民族主义叙事合流, 形成了更加强大的“感召力”。在这个复合叙事结构中, 本国或本民族被人为地以修辞术框定为全球化的受损者或被剥削方, 承担了全球化分配不公的损失, 而外国或其他民族成为了依仗全球化的加害者或剥削者, 占享了全球化生产效率改进的收益。一些政治人士借此号召采取保护主

义、排外主义、本国优先或孤立主义等内顾型举措，积极将逆全球化由思潮变现为政策。

### 逆全球化思潮在 2017 年的表现

第一，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频繁发生，滥用反倾销等贸易保护主义举措密集出台。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2016 年 7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WTO 成员报告发起反倾销调查 290 项，较上一个报告期的 267 项增加了 8.6%，对自外国进口商品采取临时限制进口的反倾销措施 152 项，较上一个报告期的 119 项增加了 27.7%。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大国之间围绕贸易保护主义的博弈更加激烈。为了削弱竞争者的出口优势，欧盟、日本、美国等不惜违背 WTO 承诺，以非市场经济国家为借口，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 15 条关于“2016 年 12 月 11 日，对中国出口产品采用‘替代国’价格计算倾销幅度做法必须终止”的规定。2017 年 11 月中旬，美国向 WTO 提交了长达 40 页的法律申请书，反对中国在 WTO 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2017 年 12 月 4 日，欧盟理事会通过了反倾销调查新方法的修正案，取消了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但同时又引入所谓的“市场严重扭曲”概念，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可以弃用出口国的价格，而选择使用第三国或国际价格来确定出口产品是否存在倾销。欧盟这种缺乏国际法依据的做法，为其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商继续滥用反倾销举措留下了空间。

第二，限制人口跨境流动的排外主义再兴波澜。2017 年，受恐怖袭击、难民涌入引发的系列刑事及社会问题影响，欧洲的移民政策逐渐收紧，反移民声浪高涨。2017 年 5 月，塞巴斯蒂安·库尔茨（Sebastian Kurz）执掌奥地利人民党权柄之后，大打反移民牌，成效显著。奥地利人民党也成为欧洲第一个由中右主流政党蜕变而成的民族主义排外政党，该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一举夺得组阁权，而库

尔茨本人也成为奥地利政府新一任总理。高举反欧盟、反欧元、反移民旗帜的德国选择党和荷兰自由党也在 2017 年进入两国议会，分别成为两国的第三大党和第二大党。2017 年 10 月，主张关闭欧洲边界、不接受难民并且反对过早加入欧元区的捷克富豪安德烈·巴比什 (Andrej Babis) 赢得大选，并被任命为总理。接近年末，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的反移民、限制跨境人口流动的政策也出现新动向。2017 年 12 月 3 日，美国国务院以可能妨碍美国“行使移民法律和确保边境安全”这些主权行为的进程为由，宣布不再参与联合国主导的《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制订进程。2017 年 12 月 4 日，美国最高法院批准特朗普政府对来自朝鲜及 6 个伊斯兰教国家的旅客全面实施最新版本的旅游禁令。禁令通过后，乍得、伊朗、利比亚、索马里、叙利亚及也门等 6 个伊斯兰教国家的公民，被限制入境或无法移民美国，原先在美国的公民也可能被遣返。

第三，一体化进程停滞甚至回卷，多边主义国际合作受阻。WTO 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十多年没有明显进展，一些国家不得不诉诸复边贸易或小多边贸易安排来推进一体化安排。特朗普上台后，对小多边贸易自由化安排也持摒弃立场。2017 年 1 月 23 日，特朗普签署上任后的第一份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此前几经周折才达成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 (TPP)。2017 年 10 月 11 日，特朗普会见加拿大总理表示，有可能终止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不排除与两国分别达成双边贸易协定。不仅如此，美国还开始在其他领域退出多边合作。2017 年 6 月，特朗普政府以伤害美国就业为由，宣布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2017 年 10 月 12 日，美国又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此后美国将寻求改以永久观察员国身份参与该组织事务。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对全球多边事务的退出不啻有釜底抽薪的效果。欧洲方面，英国脱欧在经过

6 轮缺乏实质性进展的谈判之后，也于 2017 年年末，就脱欧后欧洲法院在英国法律案件中的角色等核心议题取得突破。而外汇市场上英镑因此短线升值，给予脱欧的英国以正面评价，客观上是对欧盟分裂的一种鼓励。

### 回击逆全球化思潮的中国方案

回首 2017 年，一方面，逆全球化思潮由理念更多转向政策和行动，产生了较大的实际影响；但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及发达国家的有识之士对逆全球化思潮及政策的回击也十分鲜明有力。

首先，理论上的坚定回击。逆全球化思潮认定全球化对人类社会的负面冲击超过了正面影响，实际上那些全球问题并非内生于全球化，反倒多是在全球化进一步推进中予以解决的问题。习近平主席在 2017 年 1 月达沃斯论坛演讲中指出，困扰世界的很多问题，并不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习近平主席的论述，形象而生动地揭示出逆全球化思潮叙事逻辑前提上的谬误，即作为工具的全球化，为善还是为恶并非事先预定的，而是取决于相关制度安排是否具备充足的包容性。以新型全球化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新世界，不仅事在人为，并且大有可为。

其次，提出了建设性的促进新型全球化的行动纲领。一是明确了新型全球化的价值追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今世界，人类生活的关联前所未有，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也前所未有，世界各国人民前途命运前所未有地交织在一起，应当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二是明确了新型全球化的推进方向是开

放、包容、普惠、平衡和共赢。开放是全球化的基本要求，历史表明，关起门来搞建设不会成功，开放发展才是正途，为此，要深入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构建开放型经济，维护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包容是弥合全球化过程中南北差距、贫富差距的基本前提。包容性不足是当今世界普遍具有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要处理好全球化进程中公平和效率、资本和劳动、技术和就业等多方面的关系。普惠所强调的是全球化在共建基础上成果的共享，各国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共同优化全球经济资源配置，完善全球产业布局，建设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培育普惠各方的全球大市场。平衡发展对全球化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一些地区更快发展，另一些地区发展停滞，或者一些行业、领域得益于高度的全球化，而另一些行业或领域全球化滞后，都会影响全球化整体的可持续性。为此，尤其要关注全球化的薄弱区域、薄弱环节，通过发展援助、开发性融资、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投入等方式来弥补。共赢是新型全球化区别于旧全球化的内在品质，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兼顾别国发展。三是明确了“一带一路”倡议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新型全球化的合作平台。

最后，采取了推进全球化的务实行动。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中国以自身开放引领世界开放，在推进全球化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一带一路”提出四年多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在此期间，中国同有关国家协调政策、对接规划，同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同30多个国家开展机制化产能合作。2014—2016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



元，中国企业已经在 20 多个国家建设 56 个经贸合作区，为有关国家创造近 11 亿美元税收和 18 万个就业岗位。中国用行动证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不是空话，而是掷地有声的邀约和承诺。未来十五年，中国市场将进一步扩大，发展将更加全面，预计将进口 24 万亿美元商品，吸收 2 万亿美元境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将达到 2 万亿美元。2018 年 11 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各方开辟中国市场的合作搭建新平台。

总之，2017 年是逆全球化思潮泛滥而汹涌的一年，但令人欣慰的是，这一年同时也可能是人类开始携手应对全球问题、富有成效地开启新型全球化进程的一年。而我们更可以不无骄傲地指出，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作出了无愧于全球新兴大国地位的引领性贡献。

# 绿色资本主义发展遭遇困境

庄贵阳

## 缺乏道德指引的资本主义制度使得曾经美好的绿色资本主义发展遭遇困境

目前，绿色增长模式及绿色经济是国际上广泛讨论的一个新议题，有学者提出，绿色增长模式是资本主义的颠覆之作。一些西方政治家希望通过绿色革新，将现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进行绿色转型，以摆脱当前的发展困境，为资本主义的未来创新发展路径。

为了寻找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美国著名学者保罗·霍肯等人于2000年出版了《绿色资本主义》一书，首次提出将可获利性、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的商业原则系统整合到绿色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中，打造新一代兼顾经济成本与生态效益的工业发展模式。绿色资本主义可谓资本主义的升级版，是资本主义范式与生态学结合的产物，目的在于为资本主义的永续发展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

绿色资本主义的支持者认为，新兴的绿色经济是当前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然演进。这个制度的核心因素是奖励稀缺性和效率驱动，都与绿色增长相兼容。以可再生能源发展为案例——尽管有反对气候变化的争论以及目前市场上化石燃料的低价格，但可再生能源仍在大规模迅速发展。联合国报告的数据显示，2015年是可再生能源投资创纪录的一年，达到2860亿美元，是化石能源投资的两倍多。2017年4月，法兰克福财经管理大学—联合国环境署合作中心与彭博新能源财经发布了《2017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趋势报告》。报告显示，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低成本驱动下，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创新高，其投资前景大为可观。考虑到诸如此类的发展，可以说资本主

义并不是静态的。绿色增长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终结，而是它在自我进化路径上的自然延伸。

然而，批评者认为，绿色资本主义的狂热者们极大地低估了我们所面对的全球生态崩溃的严重性。为了拯救人类，发达国家需要在2050年之前减少80%的温室气体排放。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需要将排放量较大、污染较重的行业关闭，导致经济萎缩和就业流失。加之近年来世界经济并不景气，特别是英国脱欧、欧洲难民等问题，使得欧盟将重心转移到了内部。而根据《巴黎协定》等文件的要求，发达国家每年需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至2017年波恩气候大会召开，“基础四国”还在敦促发达国家尽快兑现这一承诺。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甚至认为，这一规定让“美国经济付出诸多代价，包括出口削减损失的3万亿美元、600万个工业岗位和300万个制造业岗位。这种规模的经济大屠杀是不正义的”。这就解释了不管如何抗议，世界上没有任何资本主义政府会主动接受强制性的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和资金承诺，这成为长久以来国际之间的博弈问题。

英国学者理查德·史密斯在其著作《绿色资本主义：一个不成功的经济模式》中提到一个核心的问题，那就是资本主义的逐利性和利润最大化决定了无论是否披着绿色的外衣，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在本质上和机制上都与拯救地球有着不可调节的矛盾。绿色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普遍高估了“绿色”生产的潜力，低估了地球遭受生态危险的程度、范围和速度，并提出“碳税”“能源税”等绿色补救措施不能完全消除市场外部性的，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发展范式与可持续发展也不能全面兼容。绿色资本主义支持者们经常把技术突破当作一种信条。的确，技术进步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惊喜，但绿色技术奇迹不能拯救我们。当前缺乏道德指引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失去控制，再多

的绿色修补也无济于事。世界各国必须紧急做出深刻改变，构建超越工业文明的发展范式，才能防止全球变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 绿色资本主义的最新注解：美国退出《巴黎协定》

纽约时间 2017 年 6 月 1 日，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议》，成为继尼加拉瓜与叙利亚之后全球第三个明确拒绝加入对抗气候变化阵营的国家。

近现代面临的生态危机，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的方式所导致的，资本主义扩张性与自然资源有限性两者的矛盾难以克服。诚然，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优美的生态环境并不是资本主义带来的，反而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进行绿色修补和产业转移实现的。但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和根本利益的资本主义政治对于这种绿色修补的容忍度是有限的，改造和限制资本的措施通常受到西方政党制度下选民和利益群体的左右，难以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主流。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即为显例，这是对绿色资本主义的最新注解。特朗普在声明中指出，《巴黎协定》对美国非常“不公平”。因此，他也违背了美国当初在《巴黎协议》中的承诺，既不会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援助资金，也不会按照计划削减碳排放量。

有关分析指出，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的真实目的，是在美国优先的原则下，企图利用发展美国的石油、煤炭等工业恢复美国经济、扩大就业。近年来，美国经济复苏乏力，贫富差距加大导致国内矛盾丛生，反全球化力量大行其道。在美国自身难保的情况下，根本无暇顾及全球生态保护的利益。特朗普不顾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以及国际社会的劝说，决意退出《巴黎协定》，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自我绿色调节局限性的最好注解。

## 国际间城市组织及城市联盟的发展壮大，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国家主体间合作的障碍

毋庸置疑，美国只顾眼前、独善其身的姿态，给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带来了负面影响，动摇了各国自觉履约的信任基础。发达国家虽然对美国的自私行为进行谴责，但在涉及自身利益之时，还是暴露了其狭隘性。

2017年初，英国媒体称，“当美国上一次在气候外交上打退堂鼓，即在前总统小布什任上抛弃有关二氧化碳排放的《京都议定书》的时候，欧洲曾担负起了为阻止全球变暖的谈判领导者的角色。目前欧盟又将率先进行立法，为实现在2030年前把碳排放削减40%的承诺而在成员国中分摊责任”。但是由于围绕英国脱欧、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以及保护那些威胁欧盟自身共同政策的产业等问题的分歧，一些欧盟外交官担心欧洲过于软弱，无法以一己之力领导治理气候变化的行动。

在2017年11月召开的波恩气候谈判中，发展中国家除要求发达国家兑现到2020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的承诺外，还要在2020年后加大资金支持力度。但部分发达国家却声称，他们连落实2020年前的资金承诺都有困难，甚至主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应再实施“有区别的责任”，要履行“同等”义务。发达国家的这些要求看似“公平”，实则是在逃避全球责任，背弃承诺，威胁各国合作的根基。

在2009年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之前，国际气候谈判和履约的主体都是主权国家。由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并未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减排协议，一些国际组织、城市、企业等非国家行为体自发行动起来，参与全球气候行动，并逐渐发展成区域或全球性的城市气候网络。巴黎气候峰会的召开，使城市参与气候变化行动达到

了一个阶段性高峰，城市通过展示气候行动，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经验和信心。

为动员各大城市采取行动、共同提高政治意愿，推进联合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长期战略，在 2014 年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起成立“全球市长联盟”（Compact of Mayors），试图通过建立一个共同的平台，把不同的城市联盟联合起来，展示城市集体行动的影响力，激励更多的城市、企业等非国家行为主体参与到气候行动中。全球市长公约（Global Covenant of Mayors）是全球最大的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间城市组织，最早可追溯到 2008 年成立的欧洲市长公约（EU Covenant of Mayors），旨在协助城市实现低碳发展，并且积极展示城市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作用。2016 年 6 月，欧盟主导的全球市长公约与获得联合国支持的全球市长联盟合并，成立了全球市长气候与能源盟约（Global Covenant of Mayors for Climate and Energy），目前有来自六大洲 119 国的 7100 多个城市参与，代表全球 8% 的人口。至 2017 年底，已有将近 7500 座城市加入这一联盟。

虽然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议》，但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发布声明：“美国民间已经选择了低碳的未来，即便没有美国政府的领导，尽管美国选择加入了拒绝《巴黎协定》的小阵营，我相信，美国各州、城市、企业都会挺身而出，更加努力，捍卫地球的未来。”加利福尼亚、纽约和华盛顿三个州的人口和 GDP 均占全美国的五分之一，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美国的十分之一，三位州长明确表示，他们已经结成名为“美国气候联盟”的组织，三人担任共同主席，号召其他各州参与，致力于维持美国对《巴黎协定》的承诺，更积极地应对气候变化。2017 年 7 月 10 日，350 名美国市长参与了《全球市长气候与能源盟约》的签署。

在 2017 年波恩气候大会召开期间，美国政府只派出了一支不到 50 人的小队伍参加大会，而民间代表团中仅商界代表就有 630 余人，还包括以加州州长、俄勒冈州参议员、维吉尼亚州州长、达文波特市市长、匹斯伯格市市长等为代表的政界人士。他们在大会园区外建立了自己的美国馆——“美国气候行动中心”，并打出“我们还在”（WE ARE STILL IN）的标语，宣示着部分美国地方政府积极行动的意愿，试图弥补美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不作为。

不仅如此，在波恩气候大会期间，全球 25 个城市的市长于 2017 年 11 月 12 日先行承诺：为抗击气候变化，2050 年之前将使各自城市碳排放量净值降为“零”。这些城市分布于各大洲，从加纳的阿克拉、英国的伦敦到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共覆盖 1.5 亿人口。这些城市以盟约之力，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一些国家一直受困于“零和博弈”的狭隘思维。发达国家若没有多一点的责任担当，则全球气候保护的目标实现无望。正如欧盟执委会副主席塞夫科维奇所说：“当市长们对一个低碳的未来存在共同愿景，并为此卷起袖子时，一些事情就会办成。”但由于城市及其联盟都是自下而上的自发行动，虽然展现了不断壮大的力量，传递了积极的正能量，但终究代替不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国家主体，未来仍有诸多不确定因素。

# 泛娱乐主义使娱乐成为愚乐

贾文山

回顾 2017 年，我们似乎都曾因社会中出现的“怪”现象而困惑不解。为什么靠吐槽、搏出位的营销号可以吸引大批受众？

“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以日渐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30 多年前，尼尔·波兹曼基于当时社会背景与时代语境在《娱乐至死》一书中作出了这一预言和警示。这段话放在今天来看依旧不过时，不仅是现实世界的写照，而且在当今世界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

追溯波兹曼所处的时代，电视等电子媒介正占据着人们生活的中心，其“媒介即隐喻”的理论正说明新的媒介即电子化的传播以一种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对时代的文化精神产生影响，电子传播所造成的信息过剩也引发了娱乐化。如果说，电视传播时代代表的是“娱乐时代”，那么当下空前繁盛的网络传播时代则是“泛娱乐时代”，我们沉浸在电子媒介、网络传播所带来的感性娱乐世界中，也因此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理性思考能力而娱乐至“疯”。为迎合受众，媒介娱乐化凸显，泛娱乐化现象日益突出。

所谓的泛娱乐化是指，本不该娱乐的事情被娱乐了。“泛娱乐”容易促使文化误入低俗的阴沟。艺术与市场、文化与经济都存在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通俗和庸俗、低俗也是存在界限的，国民文化素养的提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娱乐节目的制作一味地迎合部分观众的喜好，就会造成低俗文化的泛滥，不仅仅是受众的文化品位，连受众的基本判断能力都将受到损害。名曰娱乐，实属愚乐。在浓厚的



娱（愚）乐氛围下，受众对善恶美丑的概念都会变得模糊不清，如果连责任都变成了一种娱乐，将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悲哀。

泛娱乐化现象大行其道不仅对公众的价值观念、是非判断产生影响，甚至有可能成为操控公共话语的主导力量，这种现象在 2017 年的美国表现突出。

## 2017 年美国的娱乐至“疯”及其批判

纵观美国社会，泛娱乐化由来已久，从 19 世纪中期的“黄色新闻潮”，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以“辛普森杀妻案”“克林顿绯闻事件”为代表的信息娱乐化（报道中媒体极力突出暴力、死亡、性等刺激性元素以博得关注），再到就一系列事件如“9·11”事件、美国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美国媒体极尽煽情和强化爱国主义的报道，都是泛娱乐化的体现。而近两年的美国，泛娱乐化现象进一步凸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美国社会政治泛娱乐化：**关心政治从恶搞开始。美国大选已成为了一场全民的狂欢。对政治人物的恶搞、表情包层出不穷。例如，美国知名媒体的《纽约客》杂志的恶搞专栏《博洛维茨报告》（Borowitz Report）就不断制造恶搞总统的内容和假新闻。美国社会政治泛娱乐化现象反映出民主政治历史进程中娱乐兴起和政治衰退的趋势。大众在泛娱乐化的情境中进行的政治参与往往体现的是一种被操纵的民意，发出的是虚幻空洞的群体声音。

**美国社会生活泛娱乐化：**考验媒介道德底线。泛娱乐化的大众文化传播理念深入美国媒体价值观中。新媒体时代，各类夸大事实、故作煽情的新闻泛滥，碎片化信息受到追捧，而媒介也抓住用户心理，满足用户需求，泛娱乐化的假新闻不断出现。其中洋葱新闻（The Onion）、《每周世界新闻》（WeeklyWorld News）、《美国新闻》（American News）、世界真理电视（World Truth TV）等都不遗余

力地炮制各种令人捧腹大笑的假新闻，这与新闻所倡导的深入调查、深度报道的理念背道而驰。除此之外，美国的电视节目中关于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的不当调侃和违背道德底线的内容时有发生。从奥斯卡主持人调侃亚裔小朋友到美国福克斯电台播出辱华节目，从脱口秀节目的无底线恶搞到真人秀节目大肆展现人们“私生活”，都因媒介的道德自律弱化而导致低俗化的倾向。

**美国个人生活泛娱乐化：**娱乐至“疯”的个人生活。“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是对当下网络直播中受众心理的展现。直播社群成为“个人化的社会性空间”，封闭直播所构建的虚拟环境，模糊了原本清晰的私人生活与公共空间的边界，也成为“电视人”和“容器人”的前兆。更为重要的是大量以生产娱乐内容为主的视频直播极速涌现，受众注意力转移并过度集中于泛娱乐内容。直播内容中充斥着各类出位表演，甚至是色情、暴力等违背伦理与法律的乱象，甚至造成公共危机。2017年，美国就发生多起通过社交媒体直播自杀的事件。2017年1月，一名12岁的格鲁吉亚女孩在FacebookLive直播自己上吊自杀。4月份，一名克利夫兰男子枪杀了一名74岁的男子，向全世界直播这一暴行。泛娱乐化现象使美国政治、社会、个人生活领域沉溺于娱乐世界当中而丧失自由，丧失理性思考能力。美国知识界对泛娱乐化的批评不绝于耳。

美国自由派著名杂志《大西洋月刊》记者Megan Garber于2017年4月17日以《我们是否娱乐泛滥？》为题发文叹息，娱乐至上现象在2017年的美国似乎与比尼尔·波兹曼在他的名著《娱乐至死》里所批判的1980年的那个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今的美国社会虚假新闻无处不在，另类事实和后真相泛滥成灾；而这些现象正是伴随着娱乐电视节目主持红人的日益疯狂发展到极致的。另一位美国记者Kurt Andersen比Garber说得更直白，更深刻。他在《大西洋月刊》

杂志的 2017 年 9 月版上发表长文说，从好莱坞到迪斯尼，从脱口秀到拉斯维加斯，美国娱乐产业，建立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极端自由主义和极端相对主义泛滥的基础之上，得到了信息和互联网时代的强力助推，使美国人在价值观上距清教伦理愈行愈远，失去了对真实的基本把握能力，失去了辨认真假、虚实和对错的基本能力，最终使美国社会陷于疯癫状态，使美国进入非理性时代。Andersen 担忧的是，长此以往，这种疯癫状态会使美国社会浑然而不知，恶化成美国的新国民性，使美国民族欲罢不能。他最后呼吁读者行动起来使美国社会减少疯癫，增加常识和理性，最终使美国民族重新成为理性民族。

### 防止娱乐成为愚乐，美国应该吸取哪些教训

美国的娱乐产业 (entertainment industry, 而不是 enjoyment industry), 英国的文化产业与法国的创意产业有何不同? 笔者认为, 美国视角的娱乐产业概念比英国视角的文化产业概念不仅更为宽泛, 而且其刺激性、商业性和盈利目的更为露骨, 更可能陷入媚俗或低俗; 可能是反文化或逆文化的, 甚至逆常识和基本人伦的。例如, 充斥枪支、暴力和色情等内容的一系列电视、电影和电子游戏节目尤其如此。与英美相比, 法国视角的创意产业则更注重文化创新, 更注重审美。英国的文化产业概念上较为正统, 是产业化、市场化和媒介化的文化, 是文化与现代传媒的结合, 文化作为精神资源、完整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通过再生产形成了一系列大众消费商品, 既在身体上得到了消遣, 身心也得到愉悦。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是娱乐产业的组成部分, 但娱乐产业大于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之和。对比发现, 出于经济压力和商业目的, 美国娱乐产业将满足受众低级和本能需求作为经营和开发的首要原则。因此, 美国消费主义文化对媒体及其专业主义精神产生了较大冲击, 泛娱乐化的大众文化传播理念深入美国娱乐产业价值观中。按照《大西洋月刊》作者 Garber 和 Andersen 的分析完全

可以推论，娱乐产业在美国已经导致误国误民。重构娱乐产业的哲学基础势在必行。

结合以上分析，我们发现美国泛娱乐化的一些特点，比如，在泛媒和自媒时代泛娱乐现象更加凸显，还有就是美国知识界对国家发生的泛娱乐的现象持批判态度且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尊重市场和娱乐过度，仅一线之隔。泛娱乐的充斥带来的是价值立场的混乱和无价值的狂欢，过度过分的娱乐除了造成审美疲劳和乏味，更重要的是对文化秩序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乃至瓦解，造成道德缺失、违背伦理的恶劣后果。如果以低俗非道德的内容为娱乐，那么道德底线何在？社会责任何在？历史敬畏何在？

英格兰作家赫胥黎曾经说过：“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泛娱乐化给社会生活和公众理性价值观念造成负面冲击。对于泛娱乐化的治理，需要明确泛娱乐化内容界定和题材界限，加强对泛娱乐化市场的整治，出台行之有效的政策法规。同时，媒体需要加强文化自觉，道德自律，媒体自觉，以社会共同记忆和基本价值规范为基本出发点。娱乐不应沦落为通过消费娱乐节目使人变得愚昧或更为空虚的工具，而应该成为具有填补人类心理空缺和构建使人愉悦的社会环境的佐料和滋补品。这就要求媒介娱乐产业将娱乐业当作一件高尚的寓教于乐的事业来办。

## 2017 新自由主义思潮进入式微调整期

刘 军

从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至今，尤其是以 2017 年美国特朗普新政和英国脱欧为最新标志，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都遭遇挫败，已进入式微调整时期。新自由主义思潮受到其他社会思潮的抵制和反抗，社会出现了超越自由主义的言论。

### 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国际新变化

21 世纪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广受质疑，逐渐进入式微调整期。进入 2017 年，新自由主义出现新变化，在全球范围的式微表现得更为明显。

**第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所宣扬的经济模式已经无力引领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一经济模式均遭遇重大挫败。在发展中国家，从新世纪以来，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等国就陷入了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至今仍积重难返。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美国经济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2017 年特朗普上台后，主张“美国优先”，力图缩小贫富差距，重建繁荣强大的美国。特朗普新政反对全球化，推行贸易保护主义，防止外国难民移民流入美国。可以说，特朗普新政是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分道扬镳。

**第二，在政治层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新评估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在欧洲，土耳其于 2017 年 4 月 16 日举行全民公投，批准宪法修正案，加强总统和政府的权力。公投后，土耳其萨班哲大学的杰吉兹·阿卡塔尔教授说：“土耳其过去 200 年来一直走西方化道路，但去年以来，我们开始越出欧洲价值观的轨道，寻求去西方化的道路。”除了欧洲国家，亚洲国家也在寻求政治自主道路。2017 年适逢东盟成立 50 周年，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多次表示，菲律宾要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划清界线，加强自主性，东盟也要在

“拥抱变革，融入世界”的同时，更加关注自身发展，强化在地区多边框架的“中心性”地位、发挥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影响力。2017年11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访华之际，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发表了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的封面文章“中国赢了”。文章的作者国际著名政治学家伊恩·布雷默指出，“如今俄罗斯、土耳其、印度等国领导人都追寻中国的脚步，政府一方面拥抱商业，一方面加强政治定力、经济竞争力和信息管控力。这个进程已经持续多年，使美中两国实力此消彼长。欧美国家深信人类发展的长期弧线会转向自由主义民主，但它们可能都错了”。

**第三，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意识形态，也受到其他社会思潮的抵制和反抗，社会出现了超越自由主义的言论。**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式微，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开始抬头。2017年是《罗马条约》签署60周年。自《罗马条约》开始，欧洲一体化一直致力于在欧洲各民族之间建立紧密联盟。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让这一目标变得遥遥无期。金融危机后，欧洲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进而引发了欧元危机。紧接着，乌克兰危机爆发与恐怖主义事件频发使得欧盟的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均受到威胁。欧洲民粹主义的兴起则直接助长了疑欧思潮的扩散，并推动一些成员国退欧的民意。继英国脱欧公投之后，意大利进行修宪公投失败，这意味着意大利民众的脱欧意向也很明显。2017年3月，英国正式启动“脱欧”程序，并于6月19日开启与欧盟谈判。与2007年《罗马条约》签署50周年时的欢庆相比，2017年，可以说是欧盟充满危机的一年，也是新自由主义思潮饱受质疑的一年。

### **新自由主义思潮新变化背后的内在矛盾**

新自由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历史地看，这一思潮的发展演变大体经历了如下几个时期：产生时期（20世纪20

—30年代)；蛰伏时期(20世纪30—70年代)；兴盛时期(20世纪70—80年代)；全球蔓延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其思想观点虽较为繁复，但核心内容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述，是“快速的私有化”“快速的自由化”和“快速的政府角色最小化”。

实际上，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论观点本身难以自洽，存在内在矛盾。首先，新自由主义抨击政府干预的核心理由就是国家掌握大量生产资料，导致权力过大，以致压制个人自由，造成独裁，效率低下。按照这一逻辑，不论是谁掌握了大量生产资料，权力都无法受节制，都会侵害他人的自由。所以说，国家或者政府并不是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其次，新自由主义倡导个人主义反对集体主义和社群主义。而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世界市场形成，世界经济逐渐走向全球一体化。在这种全球化的背景下，为了促进各民族、各种族的一体化进程，强调统一性显得尤为重要。于是，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扩张之初所宣扬的个人主义、极端自由主义，与建立世界市场后提出的普世价值观也会产生冲突。

### **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服务于资本全球扩展的需要**

认清新自由主义新变化的实质，首先要澄明其所宣扬的理论观点。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经济理论、政治纲领和价值理念的复合体。在经济层面，新自由主义极力推崇私有化和市场化。他们认为自由贸易和私有制是保证效率的前提，市场配置是资源有效利用的保障。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的观点是典型代表，他认为，只有个人的经济行为才是自由高效的，任何形式的经济计划、国家干预都是效率低下甚至是无效率的。在政治层面，新自由主义主张削弱政府和国家的权力，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会自行调节，无需政府干预。国家一旦掌握大量生产资料就会造成独裁，而所谓的集体主义

或公有制会因为无人监管而自我膨胀和没有节制。在价值观层面，新自由主义以人性自私论为哲学基础，主张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反对集体主义。新自由主义认为，国家、社会是虚化的概念，国家中的具体的个人才是具体真实的存在，个人的权利是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中的“理性预期学派”就提出人是理性的，每个人生而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在追求的过程中人们会调动自己的一切力量，尽可能地作出准确推断。

我们应该看到，不论新自由主义宣扬的观点和表现形式出现任何变化，究其实质而言，是服务于资本的逐利本性和金融资本全球扩展的需要。他们从抽象概念出发，将资本的自由说成是个人的自由，将市场的开放说成是人性的解放，进而将资本的自由流通和金融竞争当作“天赋权利”，为金融资本的全球控制扫清障碍。只有将这一理念根植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才能让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在世界每个角落畅通无阻。一言以蔽之，新自由主义是附属于资本逻辑并服务于资本利益的全球扩张的。



# 国际普世价值思潮的起起伏伏

孔新峰

## 利益政治到认同政治之变，对“普世价值”造成深层打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谋求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一些西方国家将其自由民主制度塑造为一种“普世价值”标准，并试图向全世界推行。这种“普世价值”的实质是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结合，是西方国家实现其全球战略部署、确立其文化霸权地位的重要对外战略之一。从理论逻辑观之，“普世价值”的前提预设乃至力量之源都在于其人性论的假定，即存在一种普遍的、抽象的人性，在尽最大可能以某种“无知之幕”或“价值无涉”的理论工具遮蔽各类族群与文化背景后，人成为单向度、原子化、趋利性的存在，进而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整套以西方国家制度尤其是美国制度为圭臬的社会正义理论与治理体系设计。

然而近些年来，文化多样性成为当今世界不争的现实，身份与认同的政治逐渐取代传统人性论意义上的利益政治，成为决定个人政治行为和国家政治运行格局的主要因素。个人及群体的身份认同，包括种族、民族、宗教、性别、文化等，日渐影响其在政治上的选择，进而影响各类政治选举结果，乃至国家的政治格局。认同政治甚至触动了现代政治对于人群分类的基本认知，“人类的科技越来越全球化，政治却越来越部落化”，“人类离其他的行星越来越近，对自己这颗行星上的同类却越来越不能容忍”。

如今，差异性、多样性已成为当今政治理论的重大议题，其不仅涉及应如何处理文化多元性以及道德、法律、政治诸方面问题，也涉及以族群、宗教、语言或国族忠诚为名的多元诉求。解殖运动、国族建设、原住民问题、外来移民问题等，莫不为这方面的思考提供了智

力刺激。上世纪 80、90 年代后，社群主义、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对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形成巨大挑战。挑战所及，甚至牵涉到对政治秩序基础的重新考量。简言之，就是一个“异中求同、合众为一的生活何以可能”的问题。

应当说，这个问题在政治思想史上并非新鲜事物，但近年来其变化呈现诸多新的特征：当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建制化之后，国家建设问题似已尘埃落定，但政治共同体内部的分殊，却日渐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诸多后发国家的国家制度建设与国族认同建设缠绕并行，对执政者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挑战下，不少后发国家逐渐对“普世价值”脱敏与除魅。美欧各国也难以免俗，在日渐尖锐的认同政治压力下，国际战略中的现实主义逐渐取代理想主义，日益逆全球化与内向化。应该说，正是上述理论逻辑构成了对“普世价值”的深层打击。

### **在美国，面对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困局，“普世价值”有所回潮**

针对“美国未来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曾列举三大方案。一是“世界的美国”，即回归到威尔逊主义，美国主导世界秩序并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二是“美国的世界”，即相信美国力量至高无上，坚守并推广以美国价值观为底色的“普世价值”，用美国模式来改造世界，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实现政权更替。三是“美国的美国”，即回归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追求美国自身的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表达的内政外交理念在相当大程度上与亨廷顿的理念相契合。总体而言，特朗普政府的基本政策走向会倾向于“美国优先”，即从“世界的美国”或“美国的世界”，回归到“美国的美国”。

美国自 20 世纪末以来一直不遗余力地兜售“普世价值”。奥巴马政府在 2010 年将“普世价值”界定为美国的安全利益之一，将“在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观”作为美国一项重要的“持久利益”。

而 2016 年末，奉行美利坚民族主义与孤立主义的特朗普赢得了总统大选，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美国主流民意由全球主义向孤立主义转向。特朗普在 2017 年 1 月 20 日宣誓就职总统后，推行了一系列“美国优先”政策。特朗普声称，“从这一刻开始，一切都是美国优先。每一项关于贸易、税收、移民、外交的决定，都将基于美国人的利益”。

在边境政策及移民政策上，特朗普签署了“改善边境安全及移民执行”“加强公共安全”和“阻止外国恐怖分子入境美国”三项行政命令，这其中包括全面执行第三版旅行禁令、修建美墨边境墙、增聘边境巡逻队员、扣留“庇护城市”经费等举措，这些举措加剧了美国社会中的排他情绪，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社会的撕裂。2017 年 8 月 11 日，美国弗吉尼亚州爆发了十年最严重的“白人至上主义”骚乱，深埋在美国多元文化下的种族主义、民粹主义日渐抬头，甚至伺机走向政治舞台。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超过半数受访美国人认为种族主义是社会的大问题。在对外政策上，基于“美国为海外付出高昂代价而其他国家都在占便宜”这样的认识，特朗普转向孤立主义与保护主义，先后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致使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与国际信誉度严重受损。

伴随着民众对美国当前局面的不满，“普世价值”也随之回潮。“白人至上主义”骚乱发生后，美国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及新纳粹分子，美国南部多个州市加速拆除邦联时期标志物。而面对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之举，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及华盛顿州结成气候联盟，表示将继续维护并执行《巴黎协定》，此外有 61 座城市的市长也共同发表声明，表示将维持美国对《巴黎协定》的承诺。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也警告美国，“如果美国

从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的许多领域抽身，那么国际社会中的其他行为体将不可避免地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白”。

《经济学人》在 2018 年特刊中刊发了《捍卫自由福祉》一文，该文指出，乔治·马歇尔在马歇尔计划宣布后所言的“当前世界的局势非常严峻”，用在当下仍然十分合适。战后的领导者在见证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所引发的暴力和悲惨后，塑造了一个自由的世界秩序，一个建立在全球价值观、人权、法治、国家主权基础上的新秩序。而今天，同样的情况降临在当今的美国，美国人应捍卫自由主义民主的恩泽，坚持这种价值观念并巩固它的根基。由此可以看出，捍卫并推动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仍被认为是美国人民的政治理想与使命。

### **在欧洲，极右翼势力迅速崛起，但仍无法动摇“普世价值”地位**

对于欧洲来说，2017 年被视为决定欧洲命运的一年。2016 年对欧洲来说是极为糟糕的一年，欧洲多地遭遇恐怖袭击，英国“脱欧”公投成功，极右翼势力在法国、德国、荷兰等多个欧洲国家崛起，欧洲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民粹主义威胁。在这样的局面下，欧洲迎来了 2017 年大选年，荷兰、法国、英国、德国等先后进行了大选，且极右翼势力在最终选举中纷纷败北，这无疑是欧洲自由民主与“普世价值”思潮存续的重要体现，意味着欧洲“普世价值”对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胜利。

2017 年 3 月 15 日，荷兰举行的国会选举拉开了欧洲大选年的帷幕，这场选举被视为欧洲抗衡极右翼势力和民粹主义的“前哨战”。荷兰自由党主席威尔德斯领导的极右翼政党由于极端排外、反欧的言论，迅速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在大选前的民调中甚至曾一度领先，但最终仍是荷兰第一大党自民党取得了胜利。在民粹主义的威胁下，荷兰创下了三十年来最高投票率。面对英国“脱欧”、难民危机、右翼

势力泛起的局面，荷兰人民最终选择了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民粹主义的继续泛滥。

在法国大选中，传统的左右翼两大政党社会党和共和党纷纷落败，“跨越左右之分”的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与极右翼势力政党领导人玛丽娜·勒庞进入最终对决。马克龙与勒庞的最大分歧就在于是坚持全球化、欧洲一体化、经济自由主义，还是坚持反全球化、反欧盟、民族主义，其实质即为全球主义、普世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争。勒庞提出“法国优先”，而马克龙则认为法国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帮助经济相对落后的边缘国家。最终马克龙取得了胜利。事实证明，勒庞“脱欧”“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极右思想，与法国自由、平等、博爱的立国精神相背离，难以被法国主流社会所接受。

2017年6月8日，英国提前举行大选。特蕾莎·梅本期望拿下更多议席，扩大保守党优势，便于“脱欧”谈判。但出乎意料的是，保守党并未取得绝对多数席位，而是出现了“悬浮议会”。英国“脱欧”进程虽然不会逆转，但特蕾莎的“硬脱欧”计划并没有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

在德国，虽然2016年发生的一系列与难民有关的暴力犯罪，极大地影响了默克尔及其所领导的联盟党的声望和支持率，导致德国选择党支持率暴涨，但默克尔及联盟党仍然没有悬念地取得了大选的胜利。虽然选择党首次进入德国国会，但联盟党及社民党仍占据议会的绝对多数议席。这也意味着，二战后德国一直奉行的政治路线与政治理想依旧占据社会主流地位，而“普世价值”也无疑包括在其中。

总之，近年来的欧洲面临着二战以来最严重的挑战。一方面，长期以来的社会福利政策导致欧洲经济在世界经济竞争中乏力；另一方面，移民、难民问题以及欧洲一体化后东欧劳工涌入，对西欧国家就业造成压力。更为严峻的是，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恐怖主义活动威胁着

欧洲民众的基本安全。在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挑战下，已经彻底世俗化的欧洲缺乏足够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保卫自身的制度与文化。在这种情况下，极右翼日益成为对抗伊斯兰激进主义挑战、进行社会动员的主导话语。极右翼势力也许短期内无法在欧洲主要国家取得执政地位，但极右翼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舆论和政府决策。在文化上，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冲突加剧，历史主义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叙事勃兴，认同政治与普遍主义之间的张力更加突出。

在马丁·路德拉开宗教改革帷幕五百周年前夕的2017年10月7日，十位欧洲学者以9种语言联名发表声明《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从鲜明的保守主义立场出发，对欧洲的政治、文化以及社会时局表达强烈担忧，尤其对文化多元主义提出激烈批评。但该宣言在欧洲却应者寥寥，这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崛起中的欧洲极右翼仍未能撼动“普世价值”的建制化地位。

# 西方左翼思潮为何陷入停滞

陈江生

2008 年金融危机后，西方社会遭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冲击，原来以为西方制度、西方的“主义”已经是终极制度、终极“主义”的观点不攻自破，许多已经偃旗息鼓或者边缘化了的思潮又开始赢得了自己的市场。典型的就是西方左翼思潮有了新发展。时至今日，这种发展又呈现出新的动向。

## 2008 年危机引发了西方左翼思潮的新发展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一度占据世界主流的新自由主义和美国霸权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政治、经济、人权、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危机日渐严重。到了 2008 年，危机首先在经济领域爆发。在危机的冲击下，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了对新自由主义和美国霸权的反思，其中左翼思潮秉承其较深厚的历史底蕴和较强的现实批判力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表现出了强大的现实冲击力。

一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发展了自身。进入 21 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在二战后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的问题开始加剧。2008 年的危机更把这些资本主义固有的问题暴露出来。作为资本主义的重要批评力量，西方左翼学者的影响因此而扩大，英国学者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于 2009 年出版的《僵尸资本主义》认为，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金融部门的过度自由和去管制化所导致的，是 20 世纪 70 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的积累或推延。安德鲁·克莱曼于 2012 年出版的《大失败：资本主义生产大衰退的根本原因》则试图恢复利润率下降规律对于资本主义危机的解释力，以证明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这些批判在新的金融危机时代为左翼赢得了不小的声誉和更多的拥趸。而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一本《21 世纪资本论》更是

洛阳纸贵，用“正在倒退回世袭资本主义的年代”的论断震撼了资本主义世界，由此产生了“皮凯蒂现象”“皮凯蒂恐慌”。人们对“财富的积累”必然引起“贫困的积累”的资本主义现象有了直观的认识，直接推动了左翼思潮在西方国家的发展。

**二是通过与“反全球化”的天然渊源得到了发展。**虽然“全球化”为社会经济总体上的发展，对先进生产力在世界范围的扩散作出了贡献，但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球化的负面作用也是显然的。尤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人口的就业和生活水平提升方面带来的负面作用，让那些自称为草根的受损者和自认为是受损者的人把所有的敌意都指向了“全球化”，因此“反全球化”也赢得了许多支持者。借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左翼思潮得到了发展。也借着来自“反全球化”力量，左翼们赢得了许多阵地。

**三是左翼思潮的发展对各国政局和社会带来较大的冲击。**西方左翼思潮的发展，对西方世界的政治格局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在法国，右翼下台，左翼上台，苏东解体后的全面右倾开始全面退潮。人们的关注点开始从用新自由主义解决问题转向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开始更多地关注失业问题、产业空心化问题。与此相应的，反思的一代开始形成，西方的许多人在对东方的崛起感到无所适从的同时，也在问自己是否走错了方向，是否应该重新设计，包括融合左翼思潮中提出的方法来设计国家的发展。

### **当前西方左翼思潮的几个新动向**

然而，西方左翼思潮毕竟缺乏成熟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指导，更多的只是针对某些问题的一些浅层次反思而已，所以其发展也会比较有限。2016年以来，已经有一些新的动向表明这一思潮的变化。

**在美国，左翼思潮已经开始退潮。**特朗普的当选只能说明美国社会并不认同左翼的兴起。于是，比希拉里更“左”的桑德斯败了，而



保守主义的特朗普又击败了希拉里。理想主义没有解决美国的问题，奥巴马执政时的一系列国际与国内政策，不但没有解决美国国内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反而让美国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产生了一系列新矛盾、困境与负面效应。这表明左翼即使有机会参与政治，其政治依然是不成熟的。因此，很大一部分美国人不干了，于是反对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特朗普当选了。当然这种退潮并非暴风骤雨式的，反而还会有许多亮点。2017年，左翼论坛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便召开了第一次左翼学者大会，在此次以“抵抗——战略、策略、斗争、团结和乌托邦”为主题的大会举行之后，美国出现了许多抗议特朗普政权的活动。因为，左翼不能从实践中解决问题，并不意味着左翼所揭示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只要左翼们揭示的问题存在，左翼思潮就会有市场。从长期来看，退潮也是暂时的。

在英国，左翼思潮则处于一个找不到定位的区间。关键是英国人显然对英国的资本主义还能不能有效发展非常迷茫，因此到底该向左去还是向右去也很迷茫。最直接的反应就是脱欧公投和公投的结果。一方面，有着深厚左翼传统而且金融危机后经济走势最好的英国本来应该留在欧盟，推进欧盟向左转，推进欧盟更多地采取关心更多底层人民福利的政策，但是英国却离开了。另一方面，英国脱欧本来是一件很“右”的事，但它却又是英国在一体化进程中没有获利或者获得利益较少的那些所谓的相对“低端”人口借机集中发力的结果。很有点“左翼民众干了右翼的活”的意思。这说明随着英国国家定位的不清，左右翼也变得含糊不清，人民更关注的是单纯的某个问题，而非政治倾向和政治观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左翼思潮向何处去，在英国也是不清楚的。大概一切都得等到脱欧完成以后才会有个新的说法。

在德国，左翼会怎么发展同样是含糊的，远不像前一个阶段能够清晰地看到它在扩张。最为典型的便是默克尔组阁的失败。作为联盟

党的领导人，默克尔已经连续四次成功当选为德国总理，然而在第四次以 33% 的选票“惨胜”之后，更是在两个月之后无奈地宣布组阁失败。此次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虽然再次成功保住了第一大党的位置，但支持率上却出现了史上最低，所以不得不面临与自民党和绿党共同组阁的复杂形势，但是自民党和绿党在难民问题上的谈判却怎么也谈不拢。左翼所希望的是生态环境问题得到积极的解决、社会更趋于民主、正义和公平、让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能够逐渐减少或者消失、实行无政府主义，实现共享机制等，因此代表中左翼思潮的绿党不但反对给难民数量设立上限，同时还要求“受辅助保护者”能够将其家属也带到德国来，这就遭到了代表中右翼的联盟党和自民党的强烈反对。终致谈判破裂，组阁以自民党宣布退出而宣布失败。一方面组阁失败，意味着代表中左翼的绿党的失败；另一方面表明了德国社会的矛盾到了难以调和的程度，这种难以调和是左右两翼的难以调和。这种斗争的表面化当然意味着左翼思潮发展的不明朗。一边是默克尔对自民党和绿党的警告表明左翼势力的强大；另一边是极右翼势力的崛起，表面左翼思潮的敌对力量同样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法国，左翼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也表明左翼思潮得到了更多的认可。在 2017 年法国大选中，最后留下了代表右翼政党的候选人勒庞和代表了中间派的马克龙。马克龙之所以获得大选胜利实际上和他的左翼出身有着非常大的关系。他的胜利某种程度上也是左翼的胜利，左翼思潮的胜利；但某种意义上也是法国社会对极右势力的胜利，勒庞冲击终于还是被其他各派联合抑制住了。但是力挺全球化和欧元区的马克龙到底有多“左”实际上很难说，虽然他早年就是个“左翼青年”，其思想不可能不是左翼思潮的一部分，因此说左翼在法国有进展也是可以的。不过，如果其对手不是极右的勒庞的话，马克龙是否会当选也实在很难说。因此我们也不能认为法国左翼在 2017 年有

太大的进展。至少，在人民中的影响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其所谓的胜利，可能更多是一时的。所以，可以说 2017 年法国左翼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会否有较大的发展还要再看。

### 如何看待西方左翼思潮的发展

从当前主要的西方左翼思潮的新表现情况来看，不确定性和发展停滞应该是主流。我们认为，这首先是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明朗决定的。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人类社会的任何阶段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当前西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从之前一时期的反危机进入到了迷茫的阶段。在内部，危机过后的停滞让人们不知道什么样的政策是对的，“谁更能展现个人魅力就跟谁走”的现象不断出现，而个人魅力当然只能是一时的，如果不能解决那些人们期待解决的问题的话。在外部，来自于东方的新的理论、新的道路的竞争，有力的竞争使得西方社会的优越感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该怎么迎接挑战实现发展，西方社会当前是没有对策的，更不用说比较统一认同的对策。这同样导致了迷茫，不确定。社会发展的内外部不确定反映到各种思潮上，反映到各种思潮之间的竞争上，也把思潮带入了不明确中。

其次，不确定和停滞也是对之前一个时期左翼思潮发展过快做再思考的结果。以奥巴马上台和连任执政为标志，代表着自由、民主、平等、全球化的左翼在前一个时期应该是发展得很快的，但是这种发展又更多的是依托人们对金融危机的不满而获得的。因此，一旦看到左翼思潮解决不了危机所带来的问题，一旦看到左翼所主张的全球化等理念实际上对西方的许多民众并无好处，再思考必然出现。理论上再思考当然会引起在政治实践上的再思考，带来左翼和左翼思潮发展的停滞。

最后，西方左翼思潮缺乏管用的指导思想，带来了其发展缺乏可持续性。西方左翼思潮能够在认真思考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

努力去批判资本主义出现的问题，并提出相关措施，这表明了左翼思潮对社会问题的回应是积极的。但是它虽然部分承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考，但并非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思想运动。因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彻底，其分析和目标也是不彻底的，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旧框架中是解决不了什么根本性问题的，甚至解决当前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良策也提不出来。不会也不可能持续高涨直至彻底改变西方社会，只会一波一波地起伏，在人民对资本主义现实不满时有一些发展，当社会发展不明朗时就跟着不明朗，当资本主义经济处于繁荣期的时候回到低潮。

（《人民论坛》2018年02期中）